

李光耀的语文观与新加坡的“双语政策”

LEE KUAN YEW'S VIEW OF LANGUAGE AND
SINGAPORE'S BILINGUAL POLICY

By

黄筱丝

WONG SIEOW SZE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JANUARY 2018

摘要

本研究以新加坡开国先驱李光耀为研究对象，从了解他的语文观中的语言和文化作为切入点，再试图透过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发展历程、特点与影响来总结儒家文化价值观在新加坡的推行。

笔者将梳理学者把新加坡儒家文化的没落归咎于李光耀的语文观和双语政策。华人常把中华文化局限于中华历史、文学、节庆和习俗，更多的忽略了主导民族核心的儒家文化价值观。

提高华文的程度与推行儒家文化价值观常被摆在平行线上，认为只要学习有深度的华文才能明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打从王鼎昌报告书发展到何品报告书，当华文被归类或为学生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地调整华语程度时都予人逐渐削弱华文的观感。这是由于英语被列为第一语言，无论学生的语文程度如何都必修英语为第一语言。于是，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更客观的看待李光耀对于儒家文化的看法与意义。

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教育报告书从《吴庆瑞报告书》作为分水岭，之后的双语之路就依循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基调，展开了种种决策的调整、特选中学的推行过程、讲华语的运动等，无不显示出新加坡政府极力保留母语

以保存人们的身份认同，并从中带出中儒家化价值观。李光耀提倡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八德，被李光耀赋予新的定义，后来还改制成了“五大共同价值观”，晋升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

如此看来，新加坡保留了民族的语文与文字，还同时保留了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保住了华族文化的“根”和继续让华语文发展其巨大的潜力和动力。

关键词：李光耀、语文观、双语政策、儒家文化价值观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focusing on the Singapore's founding pioneer – Lee Kuan Yew. The aim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in Singapore based on Lee Kuan Yew's language view, and the development, feature and influence of Singapore's bilingual policy.

The key step is to review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and trying to find out if the declining of Chinese Cultural is due to the Lee Kuan Yew's language view and bilingual policy. The scopes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lways been limited within history, literature, festival and custom. Mostly, the core driving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has been neglected.

The general perception is that raising the level of Chinese Language is equivalent to promoting Confucian cultural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master high level of Chinese language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onfucian cultural values 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Ong Teng Cheong's report evolving to He Pin's report, Chinese Language level has been adjusted gradually in accordance to student learning capability. Unlike English language level, every student is expected to master high level English regardless of their learning capability. In this sense, it gives an impression that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has been gradually weaken.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ritically review whether Lee Kuan Yew is diluting Chinese culture.

Goh Kheng Swee's report is the watershed of Singapore's bilingual policy,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that English is taught as a first language, mother tongue is taught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leads to the adjustment of various decision-making, launching of special selected school, and initiative of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and etc. These demonstrate that Singapore Government is putting great effort to preserve mother tongue, maintain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ring out th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advocated by Lee Kuan Yew is embedded with Singaporean characteristics.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ology "loyalty, filial piety, benevolence, justice, politeness, justice, honest, shame" was redefined by Lee Kuan Yew, and modified to the "five common values", which becomes the code of conducts of Singaporeans.

In this way, Singapore preserves the language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f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ucian culture is retained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spirit. To certain extent, Singapore has successfully preserved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potential and dynamic of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Lee Kuan Yew, View of language, Bilingual policy, Confucianism Values

谢词

酝酿8年的谢词，终于到了尾声。当初本科毕业后，就直接进入拉曼大学的课程推广部门（Division of Programme Promotion）工作。婚后不久，外子（张柏林博士）就建议我继续在大学里进修，一来提升自己，二来近水楼台，三来将来可给我们的孩子做个好榜样——活到老，学到老。

既然外子愿意在精神上、经济上、课业上无条件的以行动支持我进修，得益的人是我，我就这样胆粗粗地继续硕士学位。下班后重新上课的心情无比期待，尤其喜欢在课堂上听讲师们教授学问与分享，还因此认识了不少学弟妹。很快的，两年里就修完了6个科目的18个学分，剩下的就是硕士论文了。

8年的时间一晃而过。2年修完了学分，间中3年生了两个孩子，2015年因为外子得到在英国授课的机会，一家人还因此有机会到英国旅居3年。硕士论文呢？总是排在最后想完成的事。

首先感谢我的第一位论文指导老师，何启良博士。他在任院长时，赠送了好几本书给我参考，他更是研究马新人物的学者，可惜我不才，迟迟未能完成论文。何老师在拉曼大学任职3年约满后离开，虽我未能从他指导下毕业，但也已经受惠不浅。再来就不得不特别感谢我现在的指导老师，郑文泉博士。他是副教授、丈夫、父亲。郑老师每天忙于工作之余，还能发表论文、参加研讨会；回家还要照顾孩子的晚餐，功课；此外还要“照顾”象我

年纪那么大的学生。郑老师不时在我们学生群里分享一些学术的最新动态，还不时风趣地分享一些生活故事，这让远在他乡的我倍觉亲切。当然每次老师在群组里恭喜某某同学论文通过时，我忧喜参半。忧，自己的毕业遥遥无期；喜，同学的毕业给我添增无形的推动力，我怀疑老师是故意的。这么亲切、有学问和忙碌的老师，反过来感激我没放弃完成硕士学位，这是我终于可以呈交论文的理由！

另外，还要感谢中文系研究生学会的创始人拿汀周美芬，她创造了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学会，除了让研究生们能共谋策划研讨会，于2014年还让研究生学会的工委们有机会半资助到中国福州游学，欢乐情景难忘。最记得每位同学为了想顺利毕业，都挤着到朱熹家乡，村里那口井喝泉水，期许我们也能有朱熹般的智慧与才气。感激我的同学们，他们是陈威方、严秋霞、黎翠雯、温逸敏、王凤娇、阮湧侖、林丽华、余金霞和Emily小姐，感谢你们于学业上的鼓励与扶持，让我的硕士生涯充满美好回忆。尤其特别感激温逸敏，在我俩做论文最后冲刺的期间，彼此分享与鼓励。由于我人在国外，她除了忙着呈交自己的论文，还要分出一颗心，百忙中抽空帮我装订论文，跑学校，这份情谊实属难得！

再来就是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他们是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及兄弟妹们。虽然他们都不直接过问我论文的进度，但我知道他们只是不想给我太大压力。当他们知道我的论文进入最后阶段时，他们是满心期待我们一家回国相聚的日子。还有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进修硕士，经历这个学习过程，让我以后有

机会跟其他人分享当中的酸甜苦辣。我更感谢教会一班弟兄姐妹为着我的论文不住祷告，谢谢他们的体谅，让我能暂时放下教会的侍奉专心写论文，望把荣耀归于神。

最后且最真诚的感激，是我外子张柏林全力的支持。他秉着精辟的思路与他的学术经验，除了督促我写论文，他还能从各学术论文中画出重点让我参考，使我在写论文时能事半功倍。此外，我5岁与3岁的孩子——张谦益与张颂益，感激你们体谅妈妈在拼论文时能自顾的玩，还会用稚嫩的语言督促我赶快去做论文，希望妈妈能成为你们的好榜样。

在此未能一一详记要感激的人，谢谢大家的鼓励，让我终于终于能毕业了！我向大家鞠躬以表谢意，谢谢！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李光耀的语文观与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为黄筱丝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_____ 日期： _____

（郑文泉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教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15.01.2018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黄筱丝（学号：10ULM00552）在中华研究院郑文泉副教授指导之下，
经已完成此一题为李光耀的语文观与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的硕士学位论文。
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
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筱' and '丝'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黄筱丝）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 名：黄筱丝

日 期：15.01.2018

目录

	页数
摘要	i
ABSTRACT	iii
谢词	v
论文核实书	viii
论文提交书	ix
论文声明	x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的问题、目的与意义	4
一、研究问题	4
二、研究目的	5
三、研究意义	5
第三节、 概念界定	5
一、语文观	5
二、双语政策	6
三、儒家文化价值观	7
第四节、 文献综述	9
一、关于李光耀的语文观研究	9
二、关于新加坡双语政策研究	10

	三、关于新加坡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研究	13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5
	一、文献研究法	15
	二、历史研究法	16
	三、演绎研究法	16
第二章	李光耀的语文观	18
第一节、	英语的定位	22
第二节、	华文的定位	27
第三节、	双语教育的初步形成	33
第三章	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演变	41
第一节、	双语政策的发展轨迹	44
	一、教育分流体制的建立	48
	二、官方对华文教育的首次检讨	54
	三、华文教学的政策性调整	58
	四、华文课程与教学的转型	62
	五、华文教学新方向的定位	67
第二节、	英语为主，母语为辅	71
	一、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基本定调	71
	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程度	73
	三、影响	79

第三节、	强调母语的学习与文化遗产功能	81
	一、母语在文化遗产的背景	81
	二、新加坡政府从各层面推动华语的功能	83
	三、母语在文化遗产的局限	86
第四章	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价值观	89
第一节、	李光耀的儒家思想观	94
第二节、	从新加坡教育政策推行儒家伦理课程	99
第三节、	儒家文化价值观对新加坡的影响	104
	一、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个人的影响	106
	二、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家庭的影响	106
	三、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社会的影响	107
	四、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国家的影响	108
第五章	结语	109
第一节、	本研究的重要论点与发现	109
第二节、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115
引用文献		11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李光耀从小就受英制的教育体系，直到他完成剑桥大学的法律系。从殖民地时代开始，懂得英语就已经是优势。人们把精通英语的人视为第一等，懂得华语的视为第二等，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徐峰，2008：15）李光耀身为受英文教育的一等人，却在留学英国时期，被英国人称呼“华人”之余，对不懂华文而产生严重的失落感。他忘不了那种失落感，他惦记不懂华语是很严重的损失，于是造就了他把三个孩子都送入华校的原因，不让孩子吃这“文化亏”。

李光耀认同学习华语为保留华族的“根”，于1973年11月11日，他曾于教师联合会第二十六周年纪念上谈到保存东方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时说：“新加坡的生活，并不只靠着更多的旅馆、更多的宴会、越来越大的餐厅、更多的汽车、更多的高速公路、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十三个月的薪金——这一切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发展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不能认识自己，把自己和那些不同类的混淆起来，也认为是和自己一样——也即是分辨不出人同己的话，那么以上所说的一切必将是徒然的。”（黄松赞，2005：108）目的让人们清楚知道自己是华人身份，不要因为接触太多西方文化而迷失自己。

虽然如此，李光耀却没有孤注一掷的把新加坡华文化。李光耀的语文观主要表现在规定四大语言为官方语言，选择双语（英语加母语）实施学校教育；不排斥对待两种语言在功能上存在的区别，即平衡地强调两种语言的功能。（黄明，2007：22）李光耀意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沟通应该用英语、作为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也应该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工具”。他开始着手为各母语学校¹引进英语教学。李光耀是务实，他看到了英语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另一方面他也没放弃各族的母语。为了新加坡的国际社会地位及民族和谐，李光耀推行了双语政策。这可从他以英语引进各母语学校又没灭绝各母语教学可见一般。

李光耀保留了母语教学，还务实地把英语引进其他母语学校，但是其他学者却纷纷对其“华文教育”的政策褒贬不一。首先，罗爱梅表示“实行双语教育（保留母语教学并为各母语学校引进英语教学）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确保每名学生都通晓母语，并且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有所认识，同时掌握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的英语。”（罗爱梅，2003：59）由此可见，通晓母语的目的在于了解本民族的文化遗产，重要的还是掌握世界的通用语 - 英语。这与黄明认同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在于“极力突出英语，有利于各种族相互沟通，有助于新加坡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开创了民族关系和睦、国家意识统一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好局面。”（黄明，2007：24）有一致的看法。双语政策并没有为新加坡带来不良的后遗症，极力

¹ 母语学校：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学校

突出英语的政策反而加速了新加坡与世界贸易的接轨，而母语的作用在于通晓、保留文化遗产就已足够。即便如此，拥有 40 年教学经验的陈经源校长对英文的强势和华文的弱势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对华文是否能得到很好的延续，有所保留。（陈经源，2001：228）

新加坡政府花了好多心血、通过许多教育政策，目的为了保留中华文化。黄松赞对此却不苟同，他说“自推行双语制以来，不但没能改善母语学校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反而加速了母语学校在 70 年代的衰亡，使多语学校并存制迅速走向单语化。”（黄松赞，2005：106）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双语政策凑效了吗？当多语学校走向单语化时，华族子弟或许认得华语的字、音、义，但其背后的博大的文化面貌，年轻的华族又了解多少？黄松赞随后点出“中华旧俗对青少年也失去如过去的吸引力，甚或认为是迷信落后和束缚；对圣诞节的庆祝规模大大超过华人春节”（黄松赞，2005：228）而陈之权在新加坡华文课程的文化成效调查论文中指出，华文科承担着传扬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任务，有重要的文化性课程目标。他指出社会文化学者约素尔·宫扎勒兹（Josue González）把文化分成六个层次：正式文化、深文化及情境文化属于情义、道德和生活方式的狭义文化，其传播不一定须通过语言；语言与交流、人文性价值以及历史性文化则属于语言、人文和历史的范畴，是广义的文化。而在广义的文化中，人文和历史置于语言之上，是文化最高的两个层次，必须高度依赖语言来加以传扬。基于约素尔定义的文化层次，新加坡的华文课程在约素尔所述的

低层次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向学生传扬高层次文化上，则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陈之权，2008：86）

综上所述，学者们只是从单一地侧面探讨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来评论李光耀对中华文化的推崇，而且所提及的中华文化往往局限于华族的历史、文学、节庆与习俗。笔者认为，探讨中华文化的推崇应以主流的儒家思想为着重点。为达更客观及全面地研究，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 - 李光耀的语文观并且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价值观。

第二节、研究的问题、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问题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关系息息相关，当人们提及新加坡，必然想到开国先驱李光耀，所以李光耀的名字与新加坡是同位的。正如来自越南的孙努氏宁女士在《李光耀对话录-新加坡建国之路》的前面部分就这么贴切地说道：“这确是事实.....如果有两个不可分离的名字，那就是新加坡和李光耀，以及李光耀和新加坡。”（汤姆·普特雷，2010：20）笔者把李光耀的语文观及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相提并论，因为两者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李光耀的语文观，探讨双语政策的发展历程、特点与影响，从而总结儒家文化价值观在新加坡的推行。

二、研究目的

李光耀、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及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文化观这三者有着不可隔离的关系，笔者就欲以这三者关系来带出这份论文的研究目的。一、了解李光耀的“语文”与“文化”的联系观，即华语文和儒家思想的联系内涵；二、了解李光耀透过双语教育来安排华人的“语文”和“文化”的具体措施与过程；三、了解李光耀与新加坡双语教育在达成华人“语文”与“文化”目的方面的功效与局限。

三、研究意义

新加坡作为华族占大多数的国家，维护与传承中华文化，也成了新加坡重要的任务之一。许多学者把新加坡中华文化的没落归咎于李光耀的语文观和与之息息相关的双语政策。中华文化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华族的历史、文学、节庆与习俗，而忽略了主导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本文意图探讨李光耀的语文观和双语政策对推行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作用，进一步揭开李光耀在民族精神层面上保留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概念界定

一、语文观

孙汝建是一位文学博士、教授，他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汉语语法研究。他提出了语文教育界所讨论的“语文观”包括了六种层面：语文是语言、

文学；语文是语言、文字；语文是语言、文章；语文是语言、文化；语文就是语言及语文包括语言和言语。（孙汝建，2011：71）而笔者在此论文中要讨论的语文观，则是摄取了语文是语言和文化这部分。笔者要探讨的语言是英语和华文，探讨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在此界定这两种语言在新加坡的推行，还有新加坡政府致力保留的儒家文化。

二、 双语政策

双语政策，即双语教育政策（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是指政府为实现双语教育的目的而颁布的法令、法规及政策指导性文件，包括政府以书面形式颁布的法律、法案、文书、文件、通告及国家领导人在公共场合所发表的言论、通知、通告等。（冯增俊等，2003：317）所以新加坡学生不仅以英语学习，也学习自己本族的语言，称之为“母语”。双语政策概括来讲，是“英语及母语”。英语其实就是按照其工具性功能，对于经济的发展、使各族间拥有共同语言有着极大作用；而母语则是拥有文化性的功能，这让多元文化的新加坡保留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由于华族占大多数，笔者就以这主要的双语——英语和华语为探讨对象。对于双语政策的改革及演变，笔者锁定的时限为新加坡独立后，即1965年之后。这主要是新加坡独立后，拥有了自治权后是如何设定、改进及定位双语政策的。

三、 儒家文化价值观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是为新加坡儒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关于儒家文化价值观可以借用《左传》一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

《左传》中提出儒家文化对价值观次序的“三不朽”为立德、立功和立言。

（孙天慧，2017：357）立德指拥有超越于常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还足以成为世人的楷模，就如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儒家之所以推崇他们为圣人除了是他们高尚的品德，还有他们愿意放低自己身段服务人民延伸到为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能坚守自己的节操。以德治国可说是儒家理想中治国之道，但往往在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在“三不朽”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这是儒家文化价值观认为只有建立在“立德”基础上的“立功”和“立言”才具备实际的价值。儒家所谓同时兼备三不朽“内圣外王”者实在难得，所以主张内圣外王为理想，本着德行建立丰功伟绩者为用，就是“立功”。这是中国历史中很多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等大多身负官职的原因之一。“立言”的价值为“立功”之后，正如理学家有“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名”的思想。加上儒家价值观也认可实践大于理论的观点。

儒家文化的精神也概括了几个如道德理想主义、普遍和谐、自律和内在超越。（张学智，1998：88）所谓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以追求及完成卓越的道德人格为人生的最后归宿，再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做出建功立业的伟绩。

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儒家对天人合一有不同角度的论证：1. 天人皆气所构成，因而属于“万物一体”；2. 天人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现者，即天理是人理、从天理反观人理或人理反观天理；3. 天是人的价值根源，赋予人性命之理；4. 天地提供人物质生活的来源，所以人要善加护持大自然。自律和内在超越是靠内心自我的约束与意志力来完成道德行为，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进而与宇宙合一。

儒家文化价值观里的道德观念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之上，它不像其他学派如基督教有一个外在形象与超越的绝对者作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所以融入中国文化里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只具有淡薄的宗教精神。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若要推行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就必须在乎其他民族的感受与忧虑，因此新加坡政府提倡的儒家思想须具备超越多元种族的矛盾与能促成各族群融合相处为前提。

首先，新加坡政府把儒学定位在思想精神而不是一种宗教思想，其特质具备与各族群的文化思想共融。（卓福安，2010：45）那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文化。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就把儒家“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八个字变成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而李光耀还把这八字赋予新的含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文化，正是通过李光耀的改造和发挥，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新加坡成功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四节、文献综述

一、关于李光耀的语文观研究

郑文泉在《绝代英华-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中那篇〈英属三圣：辜鸿铭、林文庆、李光耀〉里提及李光耀为“圣哲”之一，圣哲为对“睿智的，贤明的判断”及今日西人眼中的东、西方文明的“沟通者和中间人”。李光耀在多处为“双语政策”就是“东体西用”的政策作辩护时，一再强调他个人是“跨越社群、跨越社区”的模式，让众多学者和传媒对他（李光耀）的政策及背后的理念提出猛烈的批评，成为“平价两极化的人物”。由于李光耀的时代背景、语言背景及生活背景造就这么一个东西方文明眼中的沟通与中间人，所以从此著作中可了解李光耀对华语文与儒家思想的微妙联系。

李元瑾的《东西文化的冲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虽然和李光耀的语文观及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文中的灵魂人物与李光耀都是处于的英殖时代和背景有着莫切关系，所以笔者才会翻阅此书以了解更多在英殖时期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后期（学成后在社会做出的贡献）对于本身的华人文化又如此向往而以此做为借鉴。尤其李光耀透过双语教育来安排华人的“语文”和“文化”的具体措施与政策，明显看出李光耀不想错失华人本族的华语文和儒家思想。

李光耀的《回忆录（1965-2000）》中其中一章〈一种共同语〉，描述了他对文化的失落，此后决心学懂华语，为维护华族的“根”。当然，此文章中他也提到了当年决定把英语引进各母语学校的目的。当他做出这些改变的若干年后，他逐渐看到了一个民族失去本身文化所存在的隐忧，他开始逐步的改变与加强他的华文教育。

李光耀于《学语致用》中分享他的华语学习心得。里头收藏了他的学习笔记，为何要学习华语。此书中，可以看出李光耀对华语的热爱与坚持，是很好研究为何他深爱华语及如何在其教育政策中做出改革。

汤姆·普特雷《李光耀对话录-新加坡建国之路》可说是李光耀与这位来自美国新闻从业员作者有着最真诚的对话。因为李光耀说：“汤姆，这本书必须有批判性和负面内容，我知道，你不必为我担心。你就照着你所看到的我写吧！其他的顺其自然。就从你所看到的一切来讲述我真正的故事。我只要求这些。”（汤姆·普特雷，2010：16）

二、 关于新加坡双语政策研究

李光耀《*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 2011*》透露他从来没有后悔在新加坡执行的“双语政策”。此外，他也提及在新加坡受英文教育及华文教育的华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中探讨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开始结了多少成果。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的《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中的“语文和价值观”是收录了李光耀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在国内外发表的演讲和访问稿，让人能从中了解贯穿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形成、演变及成熟发展。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讲述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如何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李光耀排除了许多各方各族的困难，还是坚持了双语政策，如捍卫华教人士批评他没有把华语维持在第一语文的水平；马来及淡米尔社群则担心受到过度重视的华文会使马来淡米尔文因此而被边缘化；受英文教育的家长也不断施压，希望华文课业不会变成孩子沉重的负担；于政治于文化传承的目的与使命拉锯着，双语政策之路，还要大步走下去。

莊永康的《新加坡华社研究》中探讨新加坡华社现处于什么近况。他把此书细分成几大类，尤其“华文教育”这一章更是带出新加坡年轻一代“有语无文”、“有文无化”的隐忧。

吴元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里详细的分析了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独立时对华文教育政策的记录。此外，书中的〈李光耀对华文地位的基本立场剖析〉也淋漓尽致、抽丝剥茧地表达李光耀身为一名华人，如何看待华文到如何调整华文教育政策以配合时代需求的定位。

柯永红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语教育政策之比较〉提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国情背景相似的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需要而制定及实施了一系列的语言政策。这是一篇很好看出双语/多语政策或更贴切的说是华文教育政策在这两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黄松赞在〈新加坡的两种语文教育〉中详细的解说新加坡的两种语文教育政策的起源及演变。新加坡政府应对其演变的成果与影响作出客观的探讨。这篇文章可供笔者更了解双语教育在新加坡的处境。

徐雪瑛于〈新加坡华文教育评述〉里以一位教师身份分享她的这篇论文。当中提到新加坡政府如何为华文识字教学的教材而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还以因材施教的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笔者可以从此文章中更具体的看出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都是依据当时学生的学习进度及需求而作出改变。

汤云航的〈新加坡“推广华文运动”概述〉中详细记载新加坡是何时开始积极推广讲“华语运动”。“华语运动”于1979年开始推行，由华语取代方言的成绩来看，无疑是可喜的。但是，身为社会官方与商业用语的英语，华语始终处于下风。有李光耀开幕的“华语运动”，一直延续至今的运动，可否提升在新加坡讲华语的兴趣？此篇文章给了笔者许多参考资料。

三、 关于新加坡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研究

黄海涛的〈试论李光耀的儒家思想文化观〉中对李光耀的治国方针所蕴含的儒学成分进行剖析述评，从而揭示李光耀那富有特色，东西合璧新加坡模式的儒家思想文化观。他把儒家的思想文化融于他的治国方针中，形成按东方人的人伦价值观念与社会组织建立的重亲情、讲仁义、博爱、和谐、和平、容忍、中庸的社会体系与家庭生活，同时再辅以西方的敢冒险、重成就、善创业、立新意、追求真善美的人生态度，建立了一个东西兼备、即重伦理又重制度的新加坡社会。

陈之权的〈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谈当前新加坡华文课程的文化成效〉中提及当前的新加坡双语教育体系，让华文科目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任务，如传扬华族文化与传统的价值观。此调查也显示，新一代新加坡华族学生中华文化知识的不足，这是当前华文课程设置上以道德为主要的取向必然结果。

朱意秋和郑敬高的〈新加坡的现代化与传统儒家文化探析〉提到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讲怎么做人。个性、自我发展、人权这些被认为属于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市场、竞争、法制等资本主义现代化因素，已经完全被新加坡现代儒家融汇到了新加坡本身的伦理结构之中。所以，作为新加坡的领导层，传统的儒家伦理和他们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教育并不矛盾。这两种价值体系的融合意味着儒家虽未能给人们走向现代化以直接直接的精神动力，但于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关怀，对于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仍有某种积极意义。再

来，现代儒家的伦理观不是历史上一些行为准则的照搬，而是适应现代生活与发展潮流的重新演绎。

李世家的〈儒家价值观取向与新加坡文明〉提到儒家价值观的取向及其在新加坡推行后所得到的成就，当中包括了仁政观、德治观、齐家观和中庸观。这其中四种儒家价值观已经融入了新加坡的生活政策，当然也深深影响着新加坡人民的道德教育观。而儒家价值观取向的现代意义则为治疗“时代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人情淡薄、传统美德沦丧等）、抵御现代西方灰色价值观的思想武器及儒家价值观已突破原来的时空界限，有日益被认同的趋势。

张亚群的〈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评析〉点出李光耀政府于 70-80 年代开始强化儒家伦理教育是为了解决国内社会现实问题。后来基于新加坡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倡导儒家伦理教育既有客观基础，又为其培植自己的社会文化根基，增进同源民族文化认同所必需。

陈文和梁茂春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新加坡的实践〉文中收录李光耀的一段话：“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保留它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具体包括在五伦内的价值观，将能促进家人与家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政府之间，良好有序的关系”。李光耀将儒家八德的“忠、孝、

仁、爱、礼、义、廉、耻”赋予新涵义，剔除其中的男尊女卑等不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以作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

王文钦的〈新加坡儒家文化三特征〉说明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生活在新加坡各籍贯的华族带入，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一直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此文章认为摆脱宗法势力，与科学管理模式相结合，以及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与推广，是儒家之所以在新加坡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五节、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也称情报研究、资料研究或文献调查，是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分析，形成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杜晓利，2013：1）

在进行一个题目的研究之前，都要充分地占有和掌握与所要研究有关题目的资料和事实，了解题目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发展历史和现状，区分已完成和需要完成的研究，就需要运用文献法。为了解李光耀的语文观、新加坡双语政策及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对新加坡年轻一代有语无文或有文无化的趋势。笔者通过图书馆、网络搜集大量有关李光耀的著作、新加坡双语政策的资料、有关新加坡儒家文化观的论文，并进行认真的阅读、梳理

以及客观地分析收集到的资料，进一步对相关文献鉴别、吸纳，以充分掌握本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二、 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对相关历史过程的史料进行研究、解释、分析和整理，探求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进而了解历史运用于现在及预测未来发展。历史研究法要求研究者要广泛地搜集原始材料，然后认真地核查与辨别材料的真实性。此外，研究者不仅是罗列历史的发展，还可以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分析与思考。研究者须特别留意引用材料的时间性和地域性还有综合看待材料的价值。（陈志刚，2013：76）

笔者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与本论文有关的原始史料，例如新加坡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规章制度、决议、规划、条例等材料的时间性，再针对当时新加坡的社会情境而做出综合的结论。

三、 演绎研究法

演绎研究法就是从普通性结论或一般性事推理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表现在逻辑学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是一般事理，小前提是论证的个别事物，结论就是论点。演绎法的特征是从一般到个别，也就是从一般的原理为前提去论证个别事物，从而推导出一个新的结论。（李章吕，2008：42）

本文对李光耀以为华语文教育有助儒家思想的养成，意即华语文本身的成语、谚语、名句等内涵蕴具儒家思想的内容，所以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就是特别采用英语为工作语，母语为文化传承的语文，想把这些儒家思想的内涵分析出来，然后通过教学或法律把儒家思想根植在新加坡人民的心中。进而探讨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及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有语无文或有文无化的趋势。

第二章 李光耀的语文观

李光耀，一个不陌生的名字，他是新加坡建国之父。从一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小国，发展成为至今全球瞩目的先进国。新加坡的先进，不但从经济中领先亚洲，连它的双语政策也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不断在精益求精，目的让新加坡人民能够掌握至少两种语文（英文和母语），与世界的顶尖科技、知识第一间接轨，也不忘本身的母语，懂得自己本族的根，从而建立本身的自信与自豪。

这不得不提及李光耀从小经历独特的语言生活和语言观念说起，所以他深深体会新加坡的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语言的政治问题，他花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及学习，最终制定了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很大程度上为了配合国情，而衍生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在新加坡，国语（马来语）是象征性的语言，只在国歌和军队中发号施令中使用；英语属于工具语言，是直接获取英语世界知识的工具性语言；母语是文化语言，负责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有收录了一段李光耀对语文的看法：任何语文的形成，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由听而了解音的意义，这是不同于认识字的符号。第二，运用那些音来传达你的意念和你要表达的意义。这是两个不

同的程序。第二比第一容易，因为从听音而求了解比发音更困难。第三是发展到文字 - 这甚至在文明的历史上，也是比较后期的发展。把你所用的音变为文字，你就可以把文字长久保留下来，你也可以用书写的形式，传达你的意思。（李光耀，1994：384）可见李光耀对语文的认真，从而谨慎地选择务实与文化都能达至平衡的英语和华语。

众所周知李光耀本来是一位不懂中文（母语）的海峡华人，他是在 30 岁才开始学习中文。由于海峡华人的特殊身份，他从小就是以福建话、夹杂马来话和当时作为殖民地最重要的英文为主要沟通语言。由于地理环境和当时执政的英国政府关系，家庭背景稍微中上的，都会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来生活、学习及工作，很自然的英文在新加坡 1965 年之前都占有很崇高的位置。

新加坡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与肤色的族群，人们各自说着本身的方言语言，好像各自生活在个别的生活圈子中。“族群”通常指一群人拥有相同的祖先、血缘、文化或风俗习惯的群落或社区。新加坡基本上拥有四大族群，每一族群可细分为不同社区和方言群。“华人”指拥有中国血统的人，华人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方言群如福建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等；“马来人”指具有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人，可以细分为马来人、爪哇人、玻雅尼人、武吉士人等；“印度人”指所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和斯里兰卡人，他们也可以细分为泰米尔人、马拉雅兰人、旁遮普人等；“其他族群”则指其他种群，如欧亚混血人、

阿拉伯人、泰国人、菲律宾人、日本和其他少数族群等。（苏瑞福，2008：39）根据新加坡 2018 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了各族群的比例：华人占了 74.3%；马来人占了 13.4%；印度人占了 9% 及其他族群占了 3.2%。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8：5）由于多元的族群，增添了语言的复杂性，让新加坡人民的共识成了一大绊脚石，这也成了李光耀首要处理的工作。而团结人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统一语言，彼此能够沟通、理解，才能使社会和谐，继而蓬勃发展。

让不同种族的人说同样的语言，总比使他们成为同一个民族来得容易。一个民族的形成或许要经过几个世纪，但使不同种族的人说同一种语言，这要容易得多。如要统一社会的语言，就必须在一个已定型的民族社会里，加入这个社会的共同语言作为基本条件之一。

如果只学英文，这很难说服多元社会的人们摒弃自己本族的文化根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共同语，人们却又很难达到一个共识。为了解决这根本的问题，新加坡政府于独立后就一直寻求解决方案，终于落实实施两种语文政策——英语和母语政策——以求在国家前途和文化情感两方面都能取得平衡。

新加坡政府很务实的要为新一代的前途提供最好的语文配合——让他们从华文或母语学到在一个有条不紊社会的伦理和工作纪律的价值观念，再

配合英文，使他们能够吸取新的知识和方便就业。他们长大后看到的，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以及一个大不相同的亚洲。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好的掌握两种语文。语文要学得流利，总得花费精力。对于中等资质的学生或中下资质的学生来说，学习两种语文和学习一种语文比较，也许会使到语文程度较差。但是，兼懂自己的母语和英语，就算程度稍差，总比通晓一种语文来得强。不过，语文的学习，并不止于学校而已。会话、阅读、看电视、看电影、写报告或写信，都是一生中对语言最容易吸收及运用的时刻。此外，人类的头脑中有一部分掌管讲话和学习语言能力的神经系统，是人们应该趁头脑在退化以前，好好学会掌握最起码的语言应用。

1978年，身为新加坡副总理兼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于隔年提呈了《吴庆瑞报告书》，李光耀称这份报告书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石淑琴，2015：80）这报告书奠定了新加坡全新的教育制度，即以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稍有降低。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体制正式启航，这就是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不知不觉已经快40年了。而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总离不开功利与情感这两大因素。从功利上看，新加坡是国际大都市、贸易港、英语的应用范围广，利于谋生，这是广大华人送子女进英校的切实动机；从情感上来看，华人华文的认同心理使他们不忍心看到华文华校的衰亡。尽管大家知道，华校的全盘关闭势在必行。这是

华人面临的一个两难境地。80年代华文教育衰弱到令人失望的低点，华文文学的处境当是可想而知的。

从李光耀身为开国之父的执政者，为了要新加坡人民与世界接轨之余又不忘祖的情况下，毅然扛下了教育人民、带领人民前进的领头人，排除万难，用他的智慧与毅力，让新加坡人民看到双语教育的必要性。而每个政策背后，都有着最初的原因、背景及动力。

第一节、 英文的定位

首先，李光耀本身对于“受英文教育者”和“讲英语人士”这两个词语所赋予的定义。李光耀所说的受英文教育者，并非只是指那些能读、能讲和能写英语的人。他的意思是指那些曾经在马来亚的政府英文学校或教会英文学校受英文教育的人。他们不单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还因为受过本邦英校教育制度而具有某种特性的人。马来西亚还有其他能讲英语的人，诸如英、澳、美籍等人士，甚至于法国人。这里还有那些曾在中国、香港或其他地方学习英语的华人。他们不但操不同的音调，应用不同的俚语和成语，而且也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亚人的态度、特性有别。

由于新加坡建立在不同国籍、不同民族和各族群中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交流，无形中多元民族的文化融汇共生，形成独特的文明结构。在这多元文明结构中，语言成了尤其突出的特点，尤其华人中存有 11 种方言、马来人有 7 种方言及印度人有 9 种方言，这使得新加坡当时的语文和教育状况显得非常复杂。（Chiew Seen-Kong, 1980: 234）在漫长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自然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凌驾于整个社会政经文教的顶层，而其他语文则处于被压制或调整的状态。殖民当局对各民族的语文教育更是采取不闻不问，让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周进，2014: 40）政府英文学校或教会英文学校成了当时“正统”的英校教育制度。在英校教育制度下受教育的人，就是李光耀称之为“受英文教育者”。

李光耀赋予“受英文教育者”所拥有的特别性质为他们具有传统上的相同特性却不再视本身为华、巫、或印度人，他们效忠的是本地社会。他们为人诚实、态度和蔼，而且服从殖民地当局。李光耀指出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的弱点是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同时，失去了本族文化的精神，柔弱到极点。他也给出一个例子说“华族尊崇的本族价值观，一旦被学校实行的英文教育所淡化，那么学生的活力和纪律都变得散漫，行为也变得随便”。

（俞可，2015: 37）由于战前马来亚英校的课程标准灌输了他们一种完全属于英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导致他们丧失了自有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这难免让他们丧失了一些潜意识的自信心。（李光耀，1994: 366）这是由于李光耀发现受英文教育者似乎具有一种不安和犹豫不决的心态，他归咎于他

们终身说讲的、思想的，都是依靠他们所学到的语文，而不是根据他们本身文化里的思想，更何况这种语文并不是属于他们的。

受英文教育者在殖民地是优秀分子。他们在英国商行里享有很好的待遇。受英文教育者在 1942 年日军占领时，突然消失了他们的特殊地位。受英文教育者在仓卒之间，突然发现失去了殖民政府的援助，他们必须和别人在那种无情的艰苦社会里竞争。值得庆幸的是，受英文教育者在社会竞争中的表现虽不如在英国殖民时期发挥得很好，但当他们与其他口操各种语言的人进行公开竞争时，却未见全告失败。

李光耀曾在 1959 年一场记者联合会的午餐上指出英文在联合邦可能继续使用 10 年或 10 年以上，新加坡亦然。同时也没有人对英文的用处发出疑问，因为全世界的理科和技术科目，都以英语为媒介语。他还大胆预测在未来 10 年，新加坡人民不单可以在英校学习英语，同时也可以在不同源流的学校学习英语。然而“受英文教育者”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讲英语的人”。（李光耀，1994：369）

新马受英文教育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想把他们从英国人身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广大民众应有的权益，回馈社会，毕竟这些民众多半没有机会受英文教育。因此，新加坡决定要拟定一种教育制度，让新加坡所有公民能得到相同平等的教育，让国人都能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

新加坡新一代的国民，不再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制度，不再纯粹灌输英国的文化价值观，而是融入新加坡社会文化的价值观。英语的价值不再是灌输英国文化价值观的媒介语，英语让处在亚洲地理位置中的新加坡确立为最重要的官方语言。在整个国家机构中，英语一直扮演着主导的语言。直到今天，英语的主导位置依然凌驾于各种语文，无可取代。（李怡静，2016：9）“讲英语的新加坡人”在吸收新加坡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他们需要在家里或其他源流学校学习各民族的母语文化。毕竟新加坡人透过英语所认识的西方文化既不能靠得太近又不能离得太远，若靠得太近则容易失去自我，若离得太远又失去文化支撑（刘延超，2012：58）。这种张力关系，促成了李光耀对新加坡双语政策从不放松。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中曾经劝勉英校生除了要好好学习英文之外，同时不能忘记自己并非英国人。无论怎样都该保留本身所承继着的文化和那份可贵的文明遗产，借助过去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的知识与价值观作为基础，为新加坡创造一个足以自豪的现在和未来。（李光耀，2011：56）

继承本族的文化，了解本族可贵的文化遗产是如斯重要，因为通过这样，我们才能区分自己的身份定位，了解西方人有西方的文化，而我们则有自己的文化，不会混淆他人和本族的文化。这就是母语在传授基本的价值观和文化里举足轻重的原因。孩童可以不会背诵唐诗、论语、马来班顿或淡米尔诗歌，但对本族的文化至少有个概念。

李光耀自己本身就是典型的英校生，他深深惦记自己曾经失去文化根基与自信心那有怅然若失的感觉。所以他体悟到人要有高度的表现，首先必须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才能了解世界。“我说英语比说华语好，是因为我早年学的是英语。但是，即使千年万代，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并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而是东方的价值体系。我应用西方观念，西方语文，这是因为了解这些观念和语文。但是我的头脑里却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让人有自信心、有胆识、有热情和有充沛的精力。”李光耀如此回顾与省思他的语文观。（李光耀，2011：53）

除此之外，李光耀还强烈的表示人不该只会一种语言或只懂一种语文，因为这样会让自己局限于单一文化里，成了思想闭塞的沙文主义者。为了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文明和思想，认识多一种语言不会封闭自己的思想，反而让自己的眼界像开了的窗子，对人或世界都有足够的了解和容忍。

从小在英文教育系统里长大，直到成年后也是留学英国，但是就是在以英文为主的国家中生活时，才真真的明白与了解失去本族文化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反而很好的激发李光耀把不知的、不足的本身文化学回来。凭着他过人的毅力与认真，不放弃学习的态度，他终于能口操流利中文，能以中文演讲及进行日常对话。

第二节、 华文的定位

1929年，李光耀未满6岁就被外祖母安排到附近一所教华文是学校上课。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坐满了6-10岁的学生，大家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起跟着老师朗读。根据李光耀的回忆，他认为老师应该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老师教福建话比华语多。此外，他质疑老师根本没有教好华文，因为学生只是跟着老师背词语。老师也没有解释词语的意思，即便老师解释了学生也听不懂。（李光耀，1998：32）那是李光耀第一次接触华文。

外祖母是决心让李光耀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第二次把李光耀送到离家一英里的浚源学校学习华文。这是一所比较有规模的华文学校，但是李光耀对于学习华文还是感觉很吃力，因为他在家里跟父母说英语，跟外祖父母以峇峇马来语（夹杂华语词语和语法的马来语）交谈及跟附近的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参杂福建话，所以学校里授课的华文跟李光耀的生活沾不上边，非常陌生。两三个月后，李光耀终于能转到英文学校，开始他的求学生涯。（李光耀，1998：32）

日本统治新加坡时期的所有公告都以夹杂汉字的日文发布，李光耀听不懂日文也看不懂墙上的通告而曾挨了一记耳光。在日治时期，他对日军既怕又憎恶而不愿意学习日文，反而心生学华文的决心，一来希望能看懂华语

告示牌，二来华文是自己的语文，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李光耀买了几本读本自学，虽然能写大约 2000 字，但由于没有人指导而不会发音。为了避免麻烦和方便谋生，李光耀还是报读了为期三个月的日本课程，还获颁文凭。李光耀承认有学过汉字，对学习日文的确能事半功倍。（李光耀，2011：23）

从幼年时期对华文的陌生与抗拒，到了青年时期下定决心的自学华文，李光耀对华文始终感觉既陌生又亲切。直到李光耀去英国留学的一段经历，成为他日后努力不懈的学习华文，以及为新加坡人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动力。从小就深受英式教育的他在思想与行为上都带有浓浓的英国绅士作风，当他在伦敦深造时，西方人并不把他当成新加坡人或马来亚人，而是看成中国人。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到瑞士，入住一家酒店。柜台的人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回答不是，并向对方解释是来自新加坡时，没想到对方最后却说：“没关系，你就写你是中国人。”原来在对方眼里，他跟中国人并没有分别。这让他开始有了“我是华人”的意识。（李光耀，2011：25）

在英国求学时期，有无数次被人认定为华人的经历，也有机会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李光耀认为华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是那些来自西印度洋地区的华人，他们完全被本土化、不会说华语，连行为举止也不像华人，因为他们离中国最远也不会讲方言，反而那些拥有华族文化根底的华人，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李光耀对自己身为华人而不懂得华文而感到遗憾，这让他

更清楚地了解到即使过了千年万代，他的英语说得再标准、表达得再好，他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不折不扣的华人，毕竟他内心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精神价值体系。（李光耀，1994：392-393）

李光耀 32 岁开始学习华语，50 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华语文，他追述自己学习华语文的起点与动机，那就是身为华人必须懂得说华语，了解华文。对他而言，学习华文不应只是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考量，更重要的还是对母族光辉灿烂文明的认同与对先祖源远流长文化的自豪。这是李光耀坚持学习华语文不变的信念。

“要学好华语，就必须努力学习标准的华语。”这是他对学习语言所定下的期许和目标。李光耀对于学习华文是非常认真的，要学准确的发音，而不是带有方言腔调的发音，更不是带有南洋腔的华语。他深知华文是不容易学习的语文，华文不像英语可用拼音字母书写与发音，它是象形文字、方块字，不能单看文字就能读出发音。（蔡志礼，2006：18）

李光耀学习华文的小技巧是别把方块字看成神秘莫测及深奥难懂的象形文字，这难免在心理上造成不良的影响，只要肯下点学习工夫，方块字的奥妙就会不言而喻。李光耀为了更容易掌握华文的遣词用字，他会选择使用各种新科技来辅助学习，不因华文难学而放弃，反而会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学习华文。李光耀再次强调会讲华语，同时又看得懂华文，

能使人产生自信心。只有那些不会讲华语、又不懂华文的新加坡人，在国外受窘或被人嘲笑之后，才能体会那种感到不足和失落的心境。（沈平等，2010：86）

在认真学习标准华文的过程中，李光耀面对了来自竞选时的挑战、新加坡人讲方言和如何鼓励新加坡人讲华语的挑战。1955年，李光耀已经能够以华语演讲而不会感到困难。但于1961年，李光耀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为了争取芳林区，一个讲福建话的选区，他必须学习福建话才能更容易争取选民的支持，赢得民心。方言对李光耀有过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竞选的语言”。（李光耀，2011：144）除了福建话，李光耀后来也学了几年的客家话。为了赢得选民的心，李光耀常以方言作公开演讲，尤其是福建话，甚至能引经据典。

当时新加坡是由大多数听得懂福建话的群众为主，李光耀准备的演讲词都是用福建话，而华语就变得次要了。直到教育部反映给李光耀说学生不认真学华语文，因为他们看到李总理都在讲福建话。这现象让李光耀决定放弃以福建话演讲，最后一次用福建话演讲是1979年。自那以后，李光耀不再用方言（福建话）演讲，只以华语演讲。同年，副总理吴庆瑞提呈一份报告指出新加坡教育问题的根源是20年来（1959-1978）“不合自然规律”的语文教育政策。报告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非常不合自然规律，即大多

数的学校是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 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却是方言。”（李光耀，2011：141）

根据语言专家的研究，普通资质的学生没有能力同时应付三种语文，因为这会占据脑里更多的空间，使用更多头脑里的“兆字节”（megabytes），这会让许多人吃不消，也未能好好掌握个中语言能力。（蔡志礼，2006：15）新加坡学生在学校学英语和华语，回家及生活沟通却用方言，这让学生对语言的学习产生负担。英语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为了谋生、求存和发展的语言，那么要保留华语还是方言呢？尤其新加坡华人社会常使用的方言多达 11 种，华人会根据一种方言组成一个帮派，这严重分裂着华人社会，而且也阻扰着双语教育的推行。

为了重组华人社会使之团结，李光耀首先以身作则放弃方言，1979 年后的公开演讲都以华语为主。同年，李光耀推动了第一届的“讲华语运动”，目的是为了改变新加坡人根深蒂固讲方言的习惯。新加坡讲华语运动是一项全方位的运动，政府不但在宣传手法上灌输“华人华语”的意识、创造学习华语的环境，受惠的对象群还不断扩大，如初期培养的“一般华族社群”提升到培养华文文化精英。此外当初讲华语运动的目标是以华语取代方言作为华族的共同语言，逐渐升华到“认识文化”、“接触文化”等。由此可见，讲华语运动明显突破了原先的局限，不仅仅只是推广华语，而是为了学习更多

的中华文化，产生更多文化认同，达到文化遗产的重任。（阮岳湘，2005：186）

李光耀要把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除了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也能普遍运用在生活上。（李光耀，2011：148）他指出学生在学校有系统的学、读、听、写华文，那么他就能开启古今往来中华的大门。此外，华语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语言，它具备高度系统化的语法结构，还能传递文化价值观。这也是为何华语在情感上可以被新加坡华人接受成为母语。

李光耀曾经历严重的文化失落感，让他决心努力学好华文，不吃文化的亏。但是如果只懂一种语文、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新加坡如何在马来群岛中立足？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英语就扮演着新加坡文化和科技上的重要角色，与世界接轨。而人民也要掌握自己的母语，不能丧失本身的文化认同感，需保留自己的文化根源。因此，推动双语教育，是新加坡向前进的最佳策略。

第三节、双语教育的初步形成

1819年，英国为了扩张在印度的版图及和中国的贸易，选择处于地理位置优越的新加坡建立贸易港口。从此，新加坡商业和贸易的繁荣不断吸引来自邻近国家的移民如马来亚、中国、印度人等。由于文化、语言的局限，当时各族之间几乎没有交流，更没有统一的身份认同。（王丽，2010：63）据当时新加坡一位牧师齐来亚（Rev Canon D. D. Chelliah）的《海峡殖民地教育简史》介绍那时的新加坡“除了偶然有可兰经班和华人的私塾外，在欧人到来之前，并没有通常所称的学校”。（林方榕，2008：7）由此可见，殖民地政府还未建立学校之先，新加坡各族源流的传统教育已慢慢萌芽，其学科教学语言也仅有一种，即单语教育体制。

这时期的新加坡基本上盛行四种截然不同语言的学校，它们同时并存着，既英语源流学校、华语源流学校、马来语源流学校和淡米尔语源流学校。其中英语源流学校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推动下，尤其快速发展。1819年，莱佛士开辟新加坡以后就计划他的教育理念，终于在1823年4月他即将离开新加坡前准备设立一所学府——“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e）。他提出建立书院的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李光耀，1998：34）

虽然该书院的建筑工程曾被搁置，但书院的校舍终于在 1837 年 5 月完工。尔后直到 1863 年为了纪念莱佛士的开埠功勋，书院正式改名为“莱佛士书院”，它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英文学校。此外，外国教会也陆陆续续在新加坡创办英文学校。其英文教育的教学方法、教材编制、教职人员等都来自英国，具有“英国导向”的性质。（宋占美，2007：20）

根据德国传教士汤生（Rev. G. H. Thomson）在一项报告中记录，1829 年代的新加坡出现了 3 所规模很小的三间私塾，两间粤语私塾及一间福建私塾，是属于财雄人众的方言帮群兴办的。（宋旺相，1984：26）早期的华语源流学校大多数由方言帮群兴办与教学，教材是中国儒学传统典籍如四书五经，而大部分的课室都附设在庙宇、祠堂或会馆。根据许苏吾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记录着很多私塾的老师都是科举落地生，为了谋生而南下来新加坡，所以私塾的师资匮乏且素质参差不齐。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后，文化改革的浪潮蔓延至新加坡，很多私塾开始废除方言，改由汉语教学。这时的教材开始采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

淡米尔语源流的学校跟华语源流学校的办学教材、师资与教学法都一样从原来的国家引进，所以淡米尔语源流学校是“印度导向”而华语源流学校则是“中国导向”的性质。淡米尔语源流学校的发展比较缓慢，王秀南认为城市的印度人子女大多入读英校以方便日后转入英校升学、移民来新加坡的印度劳工又比较穷困、而富有的印度人却不热心办学、合格的教师乃来自

印度，但很多园坵印校的教师却不合格。（王秀南，1970：123）到了二战时期，体系不健全的淡米尔语学校还是停留在小学阶段，并没有发展中学的教育体制，学生读完小学后就只能转入英校继续升学。（林方榕，2008：7）

马来语源流学校被称为“土著教育”，因为马来文在新加坡是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也是本土人的语言。马来民族是文化与宗教教育合二为一的民族，可兰经塾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学校”。王秀南在《星马教育泛论》中说“巫人的可兰经塾，英人谓之（Kolam Class），华人则所谓马来私塾。这些私塾，通常是寄宿的。父母交给了儿子席、枕、锅、米等，到塾师的家中住宿。除了终日诵读阿拉伯文可兰经和书写外，学生们还要帮忙塾师炊事，看管稻田和果园。”（王秀南，1970：121）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前，当地已经有以阿拉伯文讲授可兰经的马来私塾。最初的马来学校并非为马来儿童的教育而设，而是为欧籍官员和传教士而设。（林方榕，2008：7）直到1834年，正式为马来儿童而设的马来文班是附设在“新加坡义学”（莱佛士书院的前身，由圣公会牧师戴拉（Darrah）创办华巫印的初级方言班）。那时殖民地政府对马来人的教育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支持，东印度公司还支出一笔巨额的津贴给马来学校。（周进，2014：49）殖民地当局的视学官史根纳（A. M. Skinner）建立了以可兰经为基础的马来学校，但他认为不应该把可兰经编入正课课程，但为了迎合马来人的要求而规定上午学习马来文，课后才学习可兰经。（Rev Canon D. D. Chelliah, 1947:73）尽管当时政府热心辅助马来学校，当时的提学司温士德（Winsatt）向他们提倡手工艺技能

(manual arts and crafts) 及把编织工艺课程列入马来语源流小学里 (张 晓昭等, 2009: 1097) 但是马来语源流学校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及体制不完 整, 只有初等教育, 断层于中等与高等教育。(宋占美, 2007: 20)

四大单语教育源流学校并存发展, 这无形中给新加坡社会发展带来巨 大阻力。最主要是各源流学校的教学内容不一致, 缺乏统一的规划, 加上各 自为政的发展出现教育质量不平衡的现象。各族学生对所生存的环境没有身 份认同感, 不同效忠的对象、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等, 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 与摩擦。为了改变多元性复杂社会环境, 新加坡早期许多有识之士就曾提出 双语教育的概念 (吴元华, 1999: 241), 希望藉由教育培养有双语能力的 学生与各民族进行交流, 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推崇双语教育的有识之士, 其中还身体力行地开办双语学校或对双语 教育进行研究。其中一位华人 Cheang Hong Lim 于 1875 年开办了 Cheang Hong Lim School, 主要教授中英文课程。(黄明, 2008: 69) 在 1885 年, 颜永成创办英华义学学校“颜永成义学”, 兼教中英文, 是难得双语兼优的 海峡华人。可惜, 英华义学最终还是改制为一所纯英校。(潘家福, 2008: 18) 1899 年, 新加坡创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新加坡华人女子学堂”, 也 是传授英汉双语课程。(黄明, 2008: 69) 可见创办双语学校的先贤们很早 就预见要学习至少两种语言, 即自己的母语(方言)及当时统治者的语言— 英语。学习母语(方言)是为了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学习英语因为那是新

加坡的官方行政语言，也是殖民地的顶层语言。实际上除了欧籍人士和土生的华人，并不多华族移民能精通英语。（潘家福，2008：16）

1940年，殖民地政府独尊英文，允许多源流学校并存，其目的是分而治之，把不同民族和不同籍贯的人民分隔开来，避免各民族团结起来组成反英反政府的政治效用。（吴元华，2004：47）关于双语教育的问题，新加坡一位开明的牧师齐来亚（Rev Canon D. D. Chelliah）在他的博士论文《海峡殖民地教育政策简史—以方言为新制度基础的建设》中，提出理想的双语制度是把母语作为小学四年教育的媒介语（母语+英语）。他认为在新马多元民族的社会中，这样的教育制度比较适合社会的环境。不过他同意在社会上须要一种共同语言，“而英语是明显的共同语言”。（Rev Canon D. D. Chelliah, 1947：67）此后，一些有关改善教育制度的报告书也曾提起所谓的双语教育，但都不被殖民地政府重视。与此同时，殖民地政府要求各源流学校教授英语，实施双语教育。另一方面却不打算在英语源流学校教授其他民族的语言，这样不公平的政策遭到各民族强烈的反对，以致双语教育无法实行。（黄明，2008：70）

经历了日治时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殖民政府重新回到新加坡，除了重新恢复新加坡的法律和秩序，重建战时受破坏的公共设施和建筑。此外，也重新恢复学校教育，至1945年底，有66所华文学校、37所英文学校、21所马来文学校重新复学。（陈鸿瑜，2011：50）此时，殖民地政府开始

有规划地实行双语教育体制。这是属于弱势双语教育模式，因为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快的掌握英语，再不断提高英语水平，慢慢以英语取代学生的母语，最终目标是以英国的语言和文化逐渐同化新加坡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以便新加坡人认同英国，一直效忠殖民地政府。（黄明，2008：37）

首先，殖民地政府打算把英语逐渐提升为第一语言。英语被选为“共同语”有几个原因：一，根据新加坡多元性复杂社会的背景，选择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会引起各族的不满，所以把英语作为共同语比较容易被各族接受。二，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统治者的语言、也是修订地方法律的语言，所以英语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三、英语作为商业及贸易用语，也是现代科技的主要用语，为了新加坡的经济与发展，英语自然成了共同语。（林方榕，2008：8）

其二，当英语的价值与重要性被定位后，殖民当局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法令，以压制和缩减其他语文源流学校的发展，以尽快实现英殖民理想中的双语教育目标。其中有几个主要相关的语言政策，如1948年的《十年教育计划》是最早提出要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报告书。当时的提学司尼尔逊（Nelson）提议在小学后期以英语为媒介语兼授母语教育，或以母语为媒介语兼授英语，可惜这观点受到其他殖民地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想要的是英文教育，逐渐取代其他母语。（Gwee Yee Hean, 1969：47）这实际上是殖民政府一种过渡性的双语教育政策，由于乡村的马来儿童难以适应及华族人

士强烈的反对，最终这双语教育政策未能真正的实施行。（王学风，2003：51）接着 1951 年，由牛津大学社会科主任巴恩（L. J. Barnes）为首的 13 人委员会（4 名英国人和 9 名马来人）草拟的《巴恩报告书》提出建立马来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体制，也讨论要废除华语和印度学校，连在其他非母语源流学校学习母语的权利也剥夺。（叶俊杰，2011：29）这引起了华人社会强烈的反对与不满。为了缓和华人社会的不满情绪，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于同年邀请著名美国教育家方威廉博士（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和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Dr. Wu Teh Yau）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华文教育进行研究，就是《芬吴报告书》。此报告书的建议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学习双语（母语+英语），而华人则要学习三语（母语+英语+马来语）。（陈莉，2010：92）由于《巴恩报告书》及《芬吴报告书》的结论和建议有很大的分歧且难以协调，因为前者要以双语教育教学并废除其他源流学校，后者则建议保留各源流学校并加多学习其他语言。虽然如此，这两份报告书对之后提出来的报告书有着很深的影响。

1953 年，殖民地政府在《双语教育白皮书》里的《华文学校—双语教育与增加津贴金》中，要求华校用英语教授其他科目的时间至少占到小学教学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初中的二分之一、高中的三分之二。小学的算术、中学的数学和科学都须以英语教授。（Gwee Yee Hean, 1969：92）这报告书深受《巴恩报告书》的影响，就是突出英语，限制华语学校。殖民地政府透过增加给华语学校的津贴金，要求华校不断增加英语教学的科目和时间，以

达到把各源流学校教育混合，然后融入英文教育。这个《双语教育白皮书》受到了华族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不平等的双语教育。（黄明，2008：73）于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双语教育，1955年的《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正式对双语教育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这标志着新加坡双语政策正式形成，推翻了殖民地政府的“英国双语教育”。

无可否认，从1948年起，殖民地政府开始处心积虑的“英国双语教育”以行政措施全力发展英语教育，这无形中促进了各民族对双语教育意识的觉醒，也把双语教育这个概念深植在新加坡社会。真正照顾到新加坡各民族的“新加坡双语教育”，在1959年新加坡完全自治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章 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演变

1819 年，莱佛士到新加坡开埠。到了 1824 年，柔佛苏丹和天猛公（Temenggong）同意将新加坡永远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苏丹也不得与任何国家结盟。（陈鸿瑜，2011：26）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约 3 年。二战结束后到 1959 年，新加坡再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二战后的英国开始有规划的实行双语教育，但那是属于“英国的双语教育”，并不是以新加坡多元复杂性社会的需求而制定的双语教育政策。

终于在 1959 年，新加坡经过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终于取得自治权。自治初期，新加坡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以培养人民有马来亚国家意识，为马新合并做好准备。1963 年，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联合邦，但新加坡和联合邦政府在政策上存有基本上的分歧。两年后即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奉命脱离马来亚联合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独立初期，新加坡政府深刻意识到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并存的复杂社会环境。这种复杂现象将把新加坡推向严峻的生存和发展的局限。当务之急，新加坡政府首要培养各族间的共同归属感，让人民有共同国家意识。于是，共同语言成了建立统一国家的关键因素，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流

工具，而且在培养社会身份认同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此外，语言还能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达到团结和稳定的目标。（王丽，2010：64）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安迪·格林（Andy Green）认为：“教育作为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似乎主要在国家建立过程的初期、或者在危机之后的政治重建时期发挥作用。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然而在某些国家，比如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历史过程还是相当明了的。”正如安迪·格林所论，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在时序上完全一致，教育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其巨大而独特的作用。对新加坡而言，双语教育不仅树人，而且树国。双语教育不仅是教育的基石，也是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石。（周进等，2013：70）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非母语语言作为第一语言和通行语言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徐静，2015：9）英语能快速的在新加坡这种多元种族社会中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即新加坡国家意识。人们首先承认“我是新加坡人”，然后才承认“我是华族、马来族或是印度族”。唯有国家意识增强了，才具有为国家奉献的精神和行动。（袁锐锷，1999：52）

新加坡除了奉行英语为共同语之外，同时也不鼓励各民族迷失本身的文化精髓。李光耀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坚持实行双语政策的一个持久不变

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我们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华语在情感上可以被我们接受为母语，这是一股至深且巨的精神力量，能使一个民族产生信心，去面对和克服重大的改变和挑战。（詹伯慧，1988：28）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不仅要加强其在国际的地位，同时又能得以传承民族文化。

经过李光耀对语文敏锐的观察和务实的分析后，他认为新加坡新一代的年轻人必须掌握好至少两种语文。“我们认为新加坡年轻一代能否好好掌握两种语文，关系到他们本身事小，关系到国家社会荣辱稳定事大。我们要有个富强的国家，有个稳定的社会，就要有身心都刚强勇猛的人民，能不受利诱、不惧威迫、斗志旺盛、意志坚强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只能从具有悠久历史、优美的传统文化培养出来。这样的文化来自各族人民的母语教育。但同时还能握有英文，这把通向西方高深知识的钥匙。”（李光耀，1994：56）双语政策让每一个人保留了自己的母语，同时还学习了另一种共同语言，即一种能在各族之间提供共同基点的语文。如果各族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很难达到思想上的交流。

新加坡自独立后，就开始务实的设定、改进及定位双语政策。从复杂的双语教育政策中，政府不间断地收集多方资料、研究、调查、提高双语教育师资水平、编写教育课程再到制定一套适合新加坡国情的双语教育政策。

第一节、 双语政策的发展轨迹

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合邦后正式独立后，基于政治上的立场、国家经济须依靠国际转口贸易的活动、多元复杂性社会的大环境迫使新加坡之后所制定的政策都必须围绕着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共存的三大目标。

（骆秀红，2009：9）而双语教育体制的实施，正是通过新加坡的历史背景、新加坡的未来与人们开始对双语教育意识的觉醒下被提出。

尽管在英殖民统治新加坡之前已发现有华人和马来人私塾的存在，而华语源流学校更是华族出钱出力承办的学校，可是殖民地政府始终把其他族群当成来新加坡寄居的外国人，拒绝承认他们对新加坡的进步与繁荣付出的努力与贡献，更以华文教育在新加坡“推广与本地情况格格不入的外国人文化，对培养马来亚人意识不利”为借口，对华校加以排斥与压制，引起华族普遍的不满与抗拒。（刘培栋，2006：11）

于是在 1955 年，这是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形成最关键性的一年，也是为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加坡立法会成立了当时由教育部长周瑞麟、李光耀等 9 名各党派成员组成的华人教育委员会，负责调查、建议及改进华文教育，同时能让新加坡逐渐趋向自治然后达到独立的结果。（陈莉，2010：92）同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正

式对双语教育问题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这报告书肯定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重要和母语教育的地位。报告书里有其中两条有关双语教育的政策性建议：

英语、马来语、国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四种语言中，最少两种应为各种学校教学之媒介语。其语文教授应尽可能提高水准，俾新加坡将来之教育制度能造就同样精通（如不能有三种）两种语文之学生。（《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1955：10）

在包括华文及其他方言教育之教育制度下，小学阶段应规定为两种语文之教育，中学阶段应规定为三种语文之教育。根据国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及英语四主要语言，小学教育应以家庭用语为始，然后继以英语。如以英语为开始之学生，其第二语文可随意在其他三种语言中选择之。在小学以上，或中等（中学）教育阶段中应力攻第三种语文，为期最少两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1955：38）

此外，报告书主张采用综合方法（Integrative Approach）以达到适用于各民族的特殊情况与需要，造就国家人才。除了以上两点强调平等对待各语言源流学校及小学时应该实施双语教育（母语+英语），中学则该学习三种语言（母语+英语+马来语）；再者就是各源流学校须采用共同的课程标准；推行联合校外活动计划，以促进各源流学校的交流。（周朝华，2006：67）这报告书通过了，可惜并没有认真执行报告里的建议。华校生开始学习英文而英校生也开始学习华文，可是学习的第二语文都没被纳入考试制度里。

直到 1959 年，新加坡自治时期才正式运作这报告书的建议，即小学和中学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学校才认真看待第二语文的教学。（李光耀，2011：37）

新加坡有了自治权后，李光耀身为当时的总理，他积极地争取与马来亚合并，认为这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于是，1960 年，新加坡文明规定马来语为国语（National Language），但只限于国歌和军队法号口令，英语乃是新加坡的官方行政用语。（林方榕，2008：9）从 1959 年至 1965 年是新加坡“新的双语教育”现象，也是历史上特殊的过渡时期，因为此时的马来语在新加坡只属于名义上的共同语。新加坡政府于执政初期对于双语教育的共同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为了争取与马来亚的合并而以马来语为共同语，建立马来亚国家意识；另一方面还是保留英语作为行政语及各民族学校的共同语。（黄明，2008：82）

1960 年，新加坡为了打破种族藩篱而实行混合制学校计划，这计划是由一座校舍提供不同源流的学校共同使用。如上午班是英校，下午班是华校、或者两种语文源流学校在同一时间共同使用校舍。这混合制学校的概念是让不同种族的学生，使用同一校舍以增进沟通的机会。（李光耀，2011：44）混合制学校主要以英语为共同语，不仅有利于各民族学生和谐相处、教学活动也整齐划一，对统一教学媒介语和双语教育模式也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实践和探索，为双语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周进，2014：73）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最初（1959-1965年）过渡性双语教育政策的概念是指学生必须学习国语（马来文）加上英文或华文、淡米尔文，依据学生的语文源流而定。到了1966年，教育部正式实施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以英文取代了马来文的地位，成为所有语文源流学生必修的第一语文。（吴元华，1999：248）同时从1966年起，所有小学和中学学校必须教导第二语文，即第二语文是小学离校考试的必考科及中一新生必修的第二语文。此外政府规定从1969年起，第二语文列为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考试的必考科。（陈之权，2005：29）于是，双语教育制度正式制度化。（《南洋商报》，1966年1月13日）

由于这段时期的双语教育还在摸索与发展阶段，政府并没提出统一的语文源流政策，各语文源流学校依然并存，家长们可按照个人意愿把孩子送入属意的母语源流学校。但是，英文是官方语文，在行政上与商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选择入读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逐年增加，而进入母语源流学校的学生则相对减少。这样的趋势，对新加坡未来的双语教育政策及学校的改制有着直接的影响。（陈之权，2005：30）

政策的科学性是其有效执行的首要环节。若要实现所定的政策目标，其前提是正确的制定科学性政策、然而执行时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然，就会大大损耗政策执行资源。（管华，1995：8）新加坡自独立后（1965年）对双语教育政策的科学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深入

调查，再结合新加坡实际的教育状况，而提出了各种有建设性的报告书。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执行有其阶段性和延续性，即此阶段的教育政策不仅是下阶段教育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同时能让前一阶段的教育政策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延续。（曹惠容，2009：49）如新加坡独立之初，政府就明确地采用双语教育政策并努力的执行这政策，不但如此，双语教育政策的延续性并不因为领导层的更迭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重要的阶段。每个阶段的教育改革与发展都由政府高层或教育部的领导进行推动与执行。这五个阶段各具特色，对华语文课程与教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五个阶段分别为：

- （1） 教育分流体制的建立 - 《吴庆瑞报告书》（1979）
- （2） 官员对华文教学的首次检讨 - 《王鼎昌报告书》（1992）
- （3） 华文教学的政策性调整 - 《李显龙声明》（1999）
- （4） 华文课程与教学的转型 - 《黄庆新报告书》（2004）
- （5） 华文教学新方向的定立 - 《何品报告书》（2011）

一、教育分流体制的建立 - 《吴庆瑞报告书》（1979）

（一）报告书提出的背景

1965-1975年，新加坡大力推广第二语文教育，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兴办各源流学校及聘请大量的教师。学生的第二语文及格率是提高了，但是与投

入大量的资源不成对比，也忽略了教师的素质。另外，政府积极推行两种语文兼重视数学科学和技术的全面教育，也令 1000 名小学生中约 206 名学生在未获得任何学历证明和技能之前，便退学离校；其中也仅有 106 名学生顺利升上中学并考获 O 水准考试三科或三科以上及格的成绩，及格率只有 10.6%。（李光耀，2011：60）新加坡面对这个严重的教育耗损率，提出需要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1975 年，李光耀亲自担任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长，以关注、检讨和解决新加坡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于是，新加坡政府委托经济学者出身的副总理吴庆瑞博士领导一个“教育研究小组”以全面检讨教育政策与教育运作系统。1978 年，吴庆瑞成立一队以总理公署、财政部和国防部的系统工程师组成的研究小组，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和双语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解决方案。（李光耀，2011：67）1979 年，教育部出台了《吴庆瑞报告书》，这报告书的结构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对当前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失败加以评价；第二，从社会和管理方面来探讨问题的根本原因；第三，提出改革的建议。（安妮·福斯特等，1984：20）

（二）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1979 年《吴庆瑞报告书》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革命性的改革建议。此报告书最具特色的建议是提出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实施“教育分流”的体制。

其基础就是承认个人之间的智力差异，应该以学习者为本位进行思考，贯彻因材施教的理念，以解决适龄儿童辍学率过高的问题。（高茹等，2014：24）

此外，各个源流之间对母语水平的不同要求。双语教育分流制，明确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基调。这报告书主要突出英语的重要性，对母语程度的要求基本上是继续保持水平，或可以适当地降低一些水平。（周进等，2013：72）

1. 小学阶段

第一次分流考试在小学教育三年级之后进行，也称小三分流。小学前三年的教学应集中在打好学生的语言基础，以便他们能够具备好的语言能力来学习数理科目。学生完成了三年的小学课程之后，就会参加一个分流考试。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他们会被分配到三个不同的教育源流接受下一阶段的学习。（陈之权，2005：30）

1. “普通双语源流”（Normal Bilingual Stream）开放给成绩最好的60%的学生修读英语为第一语文和母语为第二语文，三年后参加小学离校考试。

2. “延长双语源流”（Extended Bilingual Stream）开放给成绩较差的20%的学生。同样的，他们会修读英语第一语文和母语第二语文，但却要在5年后才能参加小学离校考试。

3. “延长单语源流” (Monolingual Stream) 则为成绩最差的 20% 的学生而设。他们只修读母语一种语文, 5 年后不是参加小学的离校考试, 而是直接接受技术和职业训练。(高茹等, 2014: 24)

如果“延长双语源流”和“延长单语源流”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业成绩优异(平均分达 75), 则允许转入学习进度较快的上位源流。虽然政府制定(60: 20: 20)的分流教育制度, 但根据新加坡新教育制度的调查, 1982-1986 年进入“普通双语源流”课程的学生有 90% 以上, 而分配到“延长双语源流”的学生只有 5% 左右, 被分配到“延长单语源流”课程的学生更少, 大约只有 4%, 而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Soon Teck Wong, 1988: 22) 可见这小三双语教育分流制度的目的还是倾向为大多数学生提供学习并掌握好双语的机会。(黄明, 2008: 137)

2. 中学阶段

第二次的分流是在小学离校考试之后。根据学生在小学离校考试的成
绩, 把学生分入三个不同的教育源流:

1. “特别双语课程” (Special Bilingual Course) 开放给成绩最佳的 8% 的学生, 学生兼修英语和母语为第一语文, 同时政府鼓励学生在高中时多修读一门外语为第三语文。这些学生完成初中 4 年后就参加普通教育文凭普通水准 (“0”水准) 考试。这些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非常优异, 他们

能入读政府特别选定的 9 所优秀的华文中学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接收英文及高级中文教育, 成为双语兼优的学生。(林方榕, 2008: 11)

2. “快捷双语课程” (Express Bilingual Course) 开放给成绩中上的 9%-39% 的学生修读英语为第一语文, 母语为第二语文。其他要求和“特别双语课程”一样。

3. “普通双语课程” (Normal Bilingual Course) 开放给其余升上中学的学生, 学生以修读英语为主。学生在修读 4 年后参加“中学教育证书考试”, 考试成绩优良的学生可以再修读一年的课程后参加“O”水准考试。(黄明, 2008: 137)

《吴庆瑞报告书》所提的建议自 1980 年落实后, 至今仍然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基本方针。自分流制度实行以来, 历任教育部长也对它作了一些局部上的调整, 例如将小学分流阶段从小三延后至小四、取消小学单语源流、让学生按照母语的能力修读不同水平的母语课程等。在中学阶段, 则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接受至少 10 年的基本教育, 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将中学普通源流课程进一步分成普通 (学术) 源流和普通 (工艺) 源流。普通 (工艺) 源流的学生只修读母语会话课程, 初中毕业后转入技术教育学校修读技术课程, 掌握谋生技能。(陈之权, 2005: 33)

（三）报告书的主要影响与评价

教育分流体系根据学生个别的能力，尤其语言的能力，贯彻因材施教的理念，此外也为各源流学生应达到的母语水平作了规范，即把母语列入第一语文或第二语文的位置。无形中，华文教学的问题也因此受制于分流教育体系。

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分流制的实施确定了英语作为主流语言的地位。80年代，随着《吴庆瑞报告书》的积极执行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政府更加重视英语的特殊地位。由于这样的变化发展，选择报名入读英校的人数逐年上升，其他语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则连年锐减，尤其淡米尔源流学校在1976年已没有学生来源、1982年马来源流学校也没有新生入读。于是1984年，教育部宣布将逐年将其他源流学校改制为英文源流学校。自1987年开始，除了特选中学，全国中小学都实施统一源流的教学，即英语为第一教学用语，母语是第二教学用语及各个教育阶段的必修科与必考科，以确保学生不会失去文化的根。至此，国民型学校体系正式建立。（佟毅，2010：63）然而政府或私人兴办的各语文源流学校，终于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完成其历史任务。

自推行双语教育体制以来，母语学校不但没能在竞争中改善其不利的地位，反而加速了母语学校在80年代的衰亡，使多语文源流学校迅速走向单语化。（骆秀红，2009：14）尤其华语的学习，虽然学生有长达12年的华

文基础，但只有 8% 特别优异的学生才允许修读高级华语课程。华语课程在学校教学中所占的比例偏低，如小学只占约 20%-29%，中学只占约 14%-18%。在中学里，“华文”成为单科用母语教学的科目，在小学里只有“华文”和“公民与道德教育”是用母语教学。（刘培栋，2006：7）到了初级学院、理工学院（Polytechnics）或大学的课程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除了中文系的课程，并没有第二语文的课程了。（李阳琇，1999：48）

分流体制也限制了来自讲华语和方言家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文能力偏弱，即使华文基础不差，也只能修读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这分流体制的局限在于没考虑到如何给予华文基础不弱的学生提升华文水平的机会，以及如何辅助一些因家庭语言环境而跟不上源流内华文课程的学生。这些局限将导致学生的华文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对学习华文失去兴趣或对华文产生抗拒和排斥的心理，这给华文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陈之权，2005：33）

二、官方对华文教育的首次检讨 - 《王鼎昌报告书》（1992）

（一）报告书提出的背景

从新加坡开始实施双语教育政策以来，尤其华文教育面对了最大的改革与变化，毕竟华文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本来的南洋大学已于 1991 年命名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系经过调整与改制，慢慢融入了英文教育中。此外，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文教育也转向了一门语言学科的华文教学。为了更好配合“英语为

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基调，政府除了修订华文课程的内容及改进教学法，同时也把学生学习语言的环境、考试制度、师资培训等纳入检讨的范围。

（黄明，2008：170）由华文教育转向华文教学的政策，使得政府更关注华文课程的水平与关于学生学习华文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及台湾经济力量的加强，华文除了社会功能，如在亚太区的商业、贸易和外交领域，华文成为重要的语文。（黄明，2012：236）为了维护华文学生的母语程度，加上中国经济迅速的崛起，新加坡有必要加强华文人才的培养，对中华文化有较深的认识，顺应这经济发展的局势，以加强新加坡的竞争能力。

于是，教育部针对华文教学进行了其它四次重要的检讨工作，即 1992 年由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领导的《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设》，也称《王鼎昌报告书》、1999 年由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领导的《副总理声明》，也称《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2004 年由教育部提学司黄庆新领导的《华文课程及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也称《黄庆新报告书》及 2011 年由教育总司长何品领导的《母语教育检讨报告书》，也称《何品报告书》。（谢译文，2006：23）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的报告书以人名简称为《王鼎昌报告书》、《李显龙声明》、《黄庆新报告书》及《何品报告书》。

（二）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1. 放宽中学修读高级华文的要求

教育部采纳报告书的建议，将“华文第一语文”改称“高级华文”，“华文第二语文”改称“华文”。在分流制度下，原本只让应届小六会考中成绩最优秀的 8% 的学生在中学修读高级华文，但报告书建议放宽这个限额，让成绩最优秀的 12%-20% 的学生在中学修读高级华文，并鼓励这批学生在中三阶段选修中华文学。（陈之权，2005：79）

2. 华文教材贯彻语文技能和灌输传统价值观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一向兼顾“功能性”（听说读写）和“文化性”（传统价值观）的目标。这报告书最大的贡献是把华文教学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重视学生的书写能力，转移到读、听、说。（李光耀，2011：193）这样降低了华文的深度，减低了学生的负担，打消一些学生认为华文难学的顾虑。华文课程内容的设置要在有效的帮助学生掌握华文及帮助学生认识华族的文化。教材内容要突出多样化的特点，如采集民间故事、历史故事、传奇神话和诗歌戏剧等，秉着循序渐进的教学程度，培养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兴趣。（周进，2014：143）

3. 提前学习汉语拼音及增加接触华文的时间

报告书建议汉语拼音可以提早在小学四年级前学习，这样有利于学生尽早掌握拼音的工具，及早打好华语口语和阅读的基础。为了让学生有更多

机会接触和学习华文，报告书建议在中小公民课、音乐、美术等以母语教学，这样学生接触华语的时间就增加了，加上教材的内容丰富多样化，增添学习的乐趣。（周进，2014：145）

（三）报告书的主要影响和评价

《王鼎昌报告书》公布之后，最明显的影响便是开设高级华文课程的中学，从分流教育实施以来只限定在 9 所特选学校增加到 30 余所。而自 1991 年于两所初级学院开设华文科的“语文特选课程”（Language Elective Programme [LEP]），除了教导学生较高水平的华文和中华文学，同时报告书也建议增加奖学金的名额，鼓励更多优秀的学生继续修读高级华文。（黄明，2008：178）

这一阶段的华文教学改革有其局限性，英文程度仍成为制约学生修读高级华文的条件。报告书虽然放宽了中学修读高级华文的要求，但也规定了英文成绩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周进，2014：146）这对于华文成绩优秀但是英文能力不强的学生，就错过修读高级华文的机会。

《王鼎昌报告书》全面提高了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影响了整个 90 年代新加坡的华文教学状况。可惜，这报告书没有建议如何制定特别的课程或教学法于那些对学习华文感到困难的学生。此外，在编写新华文教科书时，偏离了《王鼎昌报告书》的原意为提高华文教科书的文化成分，而不是提高

华文教科书的内容的程度，这让那些英文成绩优秀但母语能力弱的学生来说非常挑战。（李光耀，2011：1200）

三、华文教学的政策性调整 - 《李显龙声明》（1999）

（一）声明提出的背景

到了 90 年代，新加坡社会出现了新的趋势，这令新加坡必须对华文教学做出调整。首先，国民的主要家庭用语迅速改变。新加坡越来越多华人家庭讲英语，英语成了他们的家庭用语。一些讲英语的家庭发现，尽管他们的孩子花很多时间在学习华文，但是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这令他们很沮丧。

（李光耀，2011：197）

其次，心理学及脑科研究有个新发现，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与其它能力不一定成正比。例如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很强，不代表他其它科目也很强，即是语文能力和智商不能相提并论。这让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目前的双语教育有需要改制的空间。（李光耀，2011：197）

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新加坡精英提供了很多到外地发展的机会，这带来了国家归宿感的问题。政府觉得加强母语教学，有助于培养年轻一代对国家的认同感。华文不但能加强国民对新加坡共识与归宿感，随着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潜能，华语在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加强了华语的使用价值。

（二）声明的主要建议

1999年1月20日，李显龙副总理在国会中发表政策声明，声明重点如下（《联合早报》，1999年1月21日）：

1. **确立华文的教学目标：**华文教学有两种目标，一为“工具性目标”即通过华文教学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一为“文化性目标”，即通过华文教学，传扬华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
2. **培养更多未来的华文人才：**
 - a. 鼓励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
 - b. 增设特选中学
 - c. 扩大语文特选课程
 - d. 重新编写教材，保留现有教材的文化部分，把难度定在大多数学生实际可以接受的水平，同时把课本的语言用比较浅白的文字来表达，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内容，以便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 e. 帮助学习华文的确有困难的学生，为那些各科成绩都很好，唯独学习华文有很大困难的学生，增设专门的华文课程。

《李显龙声明》宣布要采取“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教学新政策。李显龙首先对英语和母语在新加坡教育系统里的定位给予肯定：“英语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所以英语作为第一语文来学习；至于母语，只要学生有能力应付，也可以把母语作为第一语文来学习；其他学生所学习的母课程

度则属于第二语文的水平。”（谢泽文，2008：76）他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配合新政策因材施教实质的协助，让学生消除学习母语的压力。

这声明关注华文特强、华文特弱及华文能力一般的三类学生群。通过这新政策，让华文能力特强的学生有更多机会修读高级华文；华文特弱的学生则通过简单浅易的语文教材来学习华文，而且这类学生选修“华文 B”的课程是注重培养华文听说能力，鼓励学生不放弃学习华文；华文能力一般的学生则学习符合他们实际水平的华文。（李光耀，2011：199-200）

（三）声明的主要影响与评价

《李显龙声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为不同家庭用语环境、不同能力的学生量体裁衣符合学生语言能力水平的华文教学目标，这给了学生很好的动力努力学习以达到能力所及的水平。（高茹等，2014：27）

这份《李显龙声明》持续放宽中学修读高级华文的要求，而且不再规定英文与华文成绩必须考到第一等的成绩才能修读高级华文。只要学生的华文成绩第一等，英文和数学成绩至少第二等也可以修读高级华文。（周进，2014：156）

教育部为了培养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不惜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增设特选中学给华文特强的学生，让他们可以继续修读高级华文；南洋初级学

院成为第三所开设语文特选课程的学院，以让学习程度中等，但华文成绩特优的初中毕业生可以继续修读高级华文；而教育部编写的《华文 B》课程，这是专门为华文程度特弱的学生而设的课程。这课程以训练学生的听说能力为主，兼及阅读兴趣与能力的培养。修读这门课程的学生主要来自讲英语的家庭。他们每一科的成绩都很好，唯独华文课例外。《华文 B》课程主要是协助他们达到能力所及的水平并使华文不再成为他们升学的绊脚石，消除他们排斥华文的心理。（陈之权，2013：82-83）

为了灌输学生对华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部于 2000 年在特选中学开设一门“中华文史知识”的课程，让中一和中二的学生修读。“中华文史知识”是必修的非考试科目，其目的为了加强学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并引发学习的兴趣；中三的学生则选修“中华文学”课程。（周进，2014：156）

2004 年，新加坡在家里讲英语的家庭不断增加，华语不再是华族的第一母语，为了挽救华文，政府特别增设华文 B 学习中心及放宽选修 A 水准华文 B 的标准。此外，2002 年开始试行的“双语并用教华文”，在华文课本中加上英文注释与翻译，协助学生掌握华文。这方法为华文教学瓶颈找到了突破。（李光耀，2011：207）

这一阶段的华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让大部分学生接受能力所及的华文课程，培养学生基本的语言能力和对华族文化的认识，让华文继续成为华族国民能够使用的语文。另一方面让华文特强的学生有机会掌握更高的华文水平、更深入的瞭解华族的历史与文化，为国家培养一定数量的双语精英，维持国家的竞争力。这样的改革理念，更符合“量身裁衣，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陈之权，2013：83）

四、华文课程与教学的转型—《黄庆新报告书》（2004）

（一）报告书提出的背景

新加坡资深教育记者潘星华曾经说过：“回首 50 年，新加坡教育景观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小国寡民，必须‘配合时代前进’而不断求变”。

（宋若云，2013：2）新加坡这个小小海岛国家，为了国家的生存之道，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为了配合时代前进的步伐或及时跟进，这也是新加坡教育最大的特色。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深广发展，华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所以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政策也需要进行调整。李光耀第一次全程参与这次的教学改革，也是华文教改动作最大的一年，可见这次的改革对新加坡而言意义非凡。

李光耀称这次的华文教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建立一套灵活的教学制度，让不同语文学习能力、不同家庭用语背景的华族学生，尽量掌握华文，尽可能取得最佳华文学习成果。新加坡要尽量营造一个讲华语的环境，让华文成为课室外实际应用的语文，是新加坡华族生活上常用的‘活’语文”。

（李光耀，2011：210）

（二）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1. 拟定四种不同的教学目标

《黄庆新报告书》被称为“前所未有、深谋远虑、朝向明天”的改革方案，认清学生个别的能力，对全体学生、大多数学生、对华文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以及少数精英学生，运用四个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李光耀，2011：211）其一，对全体学生通过“灵活”、“乐趣”两个原则，激发每一名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即使他们离开学校后仍然不减对华文和华族文化有热爱；其二，对大多数学生要求懂得听、说、读，对写的教学也应适当重视；其三，对华文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即修读高级华文及来自特选学校的学生必须很好的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其四，对少数双语精英的学生提供选修语文特选课程与双文化课程的机会，培养他们精通华文且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精英。（周进，2014：163）

2. 具体课程、教材改革和调整

这次教学的改革继续贯彻“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基调，采用四个阶段的“单元制课程教学”，主要体现在小学华文课的调整。单元教学模式（Modular Approach）是灵活地按照学生在华语学习上的起点和能力的需求而安排不同的课程，这是新加坡双语教育发展的一次重大改革。（高茹等，2014：28）入学前没有接触过华文的小一、小二学生先进入“导入单元”阶段，以提高他们听说的能力；小三、小四年级就进入“核心单元”阶段，对于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可以进入“强化单元”阶段的课程及程度最高的学生进入“深广单元”的阶段学习华文；小五、小六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将进入高级华文核心单元+高级华文深广单元的课程；修读华文（华文为第二语文）的学生将进入华文核心单元+华文深广单元的课程。（周进，2014：163-164）

为了让学生能更多浸濡在华文的环境，这报告书建议设立“附加特选学校”（SAP Plus Programme²）计划。特选小学除了在课外活动多用华语，也安排低年级更多科目以华语授课。这样小一、小二学生接触华语的时间由目前的 33%增加到 60%，中学也会配合提供更多与华文相关的科目供学生选读。（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2004：15-16）

²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Plus Programme，简称 SAP Plus Programme

3. 教学方法和师资培训的调整

报告书建议要充分利用科技资讯来教导学生学习华文。这是科技时代，学生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软件学习华语口语。此外，教育部与工业界可以合作开发掌上华文电子字典及学校允许学生利用软件写作。（周进，2014：164）

新加坡会借鉴中国“先认字，后写字”的华文教学法，让学生能更快的进入阅读状态，减少他们阅读的挫败感。

教育部为教师提供系统性的培训，协助他们做好适应新的教学情境的准备。所有的华文教师应有在职进修路线（In-Service Training Roadmap），并重视新近教师最初几年的培训。为了减轻华文教师的负担，教育部也应增聘华文教师，扩大教师来源，同时鼓励初级学院学生申请华文教学奖学金，并提供更多进修高级学位的机会以培养本土华文教学的接班人。（陈之权，2013：85）

（三）报告书的主要影响与评价

这次的改革不但肯定了之前报告书的双语教学政策的必行性、延续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法，同时让这阶段的教学改革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延续，还能作为下阶段教育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尽管华文教学由听说读写四大功能逐渐降低到听、说、读或者听、说两到三个功能的培养，但是政府通过其它方面在全社会营造华文文化环境、开发高科技的华文教学软件、调整以华文授课的科目与时间等，希望学生能在轻松、有乐趣的环境下学习华文，让学生离开学校后依然对华文有兴趣，潜移默化中加深对华族文化的认知。（周进，2014：166）

《黄庆新报告书》也比过去几份报告书更重视教师素质的提高，更关注华文教师的职业提升与专业进修的问题。报告书宣告了新加坡的华文课程与教学已经到了需要转型，华文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重新规划的临界点，其影响主要可从课程规划以及教师专业成长两个层面。（陈之权，2013：85）

关于《黄庆新报告书》在国会进行辩论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李光耀表示“我们听不见过去受华文教育议员与受英文教育议员辩论华文课题时的针锋相对，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的讨论。大家都肯定了英文的重要，同时也没有人高调反对学习华文。评论员认为这个微妙的变化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显示讲华语和英语的华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逐渐模糊，这就是双语教育实行多年的果实”。（李光耀，2011：212）如此可见，这次的改革得到了各方统一的意见。

五、华文教学新方向的定位-《何品报告书》（2011）

（一）报告书提出的背景

李显龙在 2004 年国庆演讲中表示“要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在延续性和改变之间取得平衡，保留制度里还可行和优良的部分，我们也必须改变已经过时的，并摒弃不合时宜的部分。常言道：‘如果它还好好的，就别去改变它’但我认为，如果它没有出现问题，最好维修它，给它添加润滑剂，检查它，替换它，提升它，尝试采用更好的，使它做得比以前更好。”（《联合早报》，2004 年 8 月 22 日）这符合新加坡最高领导人对双语教育政策的决心与定位，延续之前报告书优良的部分，对接下来的教学改革加以提升，做得比以前更好。

新世纪以来，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小一华族学生在家讲英语的比率，从 2005 年的 50%增加至 2010 年的 59%。而华文教师的受教育背景也有很大的改变。70%本地华文教师的学生时代是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比 2005 年的 56%有增加了。这个趋势还会持续，预测英语在未来 10 年将成为大多数（80%—85%）新加坡家庭主要或唯一的用语，而华文对华族家庭来说将会退居为第二语言，不再是母语。（李光耀，2011：218）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延续“因材施教”、“灵活与有趣”的教学，新加坡政府觉得有必要再度检讨与研究未来 20 年华文教学将面临的挑战，实现“乐学善用”的愿景。“乐学善用”的教学法不是让语文学习变得简易，

降低华文水平，而是让学生不抗拒不疏离华文，有能力修读更高层次的华文，让学生能活学活用华文。

（二）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教育部长黄永宏明确指出母语教学重心将转向应用能力的培养，华文教育在未来的两大方针是“因材施教”和“活学活用”。他指出，“因材施教”是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制订差异教学法和课程内容；“活学活用”的概念则是更精确更有效地评估及奖励达到不同母语水平的学生。（（《联合早报》，2010年5月12日））2011年1月，教育总司长何品公布了《母语教育检讨报告书》提出主要五个方面的建议：

- 1. 提升母语的沟通能力：**以日常生活的教材来教学，使母语的学习生活化。母语教学可结合学生的生活和兴趣，让学生更容易掌握及运用在贴近他们生活的环境。
- 2. 考试形式科技化：**扩大电子字典及资讯通讯科技在教学考试中的使用，如以录像进行口试、中学和高中华文B课程部分试卷允许用电脑文字输入。
- 3. 提高修读高级母语学生的兴趣：**政府会提供更多资源和机会给学生。
- 4. 为母语学习营造有利的环境：**政府将5年拨款45000万元举行“母语双周”活动，让学生能在课室以外的环境，使用母语思考和表达。
- 5. 增加母语教师人数：**政府计划5年内赠聘500名母语教师，充实教学队伍，并设立母语教学奖学金。此外，为提升华文教师专业水平，教育部也将

和南洋理工大学属下的国立教育学院和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合作。（陈之权，2013：90）

（三）报告书的影响

这次的教育改革通过更有系统地调整教学法、改变考试形式、有利学习母语的环境及活动等，基本实现了“乐学善用”的愿景。如2011年3月底，教育部课程发展署要求各校举办“母语双周”的活动时，各校都积极地配合与参与。“母语双周”活动就是在学校举办为期两周的母语活动，使学生有机会深入接触和感知母语及文化。有些学校与语文中心联系，让他们在学生休息时段能到文化摊位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各族的传统文化手工艺品等，这样的母语文化氛围，使学生对母语学习感到更有亲切感。（周进，2014：181）

本章小结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目标是为了建国及团结国人的需要，为生存而发展经济的需要，为继承本族优良文化的需要。这是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秉持的理念，普及英语使社会稳定、各民族有共同的国家意识、还能直接与国际接轨带动经济发展；保留各民族的母语更重要的是以人文为出发点的传统思想，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其最大价值在于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准则。

此外，新加坡实行的教育行政管理是属于中央集权式，即由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各级各类教育，有关各级教育方针、政策、内容、方法、规章制度及教师等，均由教育部及其下属的各局直接负责，学校拥有的权限极小。（马海玲，2009：150）这都是有利于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由于是中央集权，有一致性的标准，以致双语教育的招聘、培训、教材的编制、传播，保证政策的推广，执行经费等都变得非常方便。此外，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让各民族都有机会接受双语教育，使双语教育成为国民型的教育。

而其中华文教育面对了最大的改革与变化。华族是占新加坡人口最多的族群，于是有了各阶段的华文教育政策。这些改革既有承前，又有新变得元素。“发展听说读写的语文技能”和“传递华族文化价值观”这两大总体目标基本不变，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更是贯穿于历次的华文教学改革，直到2011年最新的“活学活用”理念，期许学生对母语有更深刻的印象与兴趣。（徐平莉，2017：130）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与开放，中国将在世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对许多工作与职业来说，掌握华文是宝贵的资产。（刘培栋，2006：8）这让一直致力推行双语教育的新加坡来说，无疑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新加坡要培养一批适应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华文人才。

而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过不断的调整与改革，培养了大量的双语、双文化精英人才，为“重造新加坡”做好了人才准备。（周进等，2013：73）

第二节、英语为主，母语为辅

一、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基本定调

一个新兴的国家百废待兴，而统一多元民族的语言成了首要任务，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就这样应运而生。新加坡经历 50 年的双语教育之路，一直不断的调整英文和各族群本身的母语教学，确保人们能掌握英语-行政语、维护各族群的共同语，另一方面确保各族能掌握自己的母语以传承祖先的文化。李光耀说：“我们的双语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一以英文为谋生工具，二通过母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李光耀，2011：46）

一个国家的共同语、国语和官方语言大多数依据国家最多人口使用或以国家民族的母语为准，而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国家却决定以英语为共同语，摒弃了新加坡人口里最多华族的母语—华语为共同语。新加坡确定这样把英语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实则有其三大方面的考量。一，历史。自新加坡被英殖民统治还建立了贸易港口后，吸引了邻近国家人民的移民，这使得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属于多元社会，并且没有统一的语言，只有统治者的语言—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也是官方语言。只要新加坡继续使用英语就可以

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二，政治。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被马来群岛包围，选择英语为共同语言，是表明其在国际上的立场，不做“第三中国”来化解国际政治危机。三，经济。新加坡的主要经济来源需要依靠国际转口贸易，而英语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媒介语，自然有保留英语的关键性。此外，英语更是让人民直接接轨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语言工具，把英语作为共同语有其必要性。（周进，2014：43）

对于母语，李光耀认为各民族应该保留自己的文化：“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民族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我们一旦失去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的，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了亚洲人的背景。”（李光耀，2011：166）

如果新加坡人民只懂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如果人民只懂英语，那人民就必须面对丧失自己文化认同感的危机。若人民失去了内心那份自信与自豪，人民将无法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李光耀，2000：180）。

为了让新加坡国民与世界接轨，同时也保留母语的理念。于1979年，新加坡采纳《吴庆瑞报告书》里的建议，“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

育。这双语教育主要以分流制度进行，采用“突出英语、保持母语”的教学理念。在突出英语的同时，没有放弃母语，努力把华语保持在一定程度（注重听说）依附和保持母语的“感情性”依附。（王艳萍等，2011：15）

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程度

（一）英语的地位

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新加坡不断调整英语的地位和功能，好让英语能更好地服务于新加坡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新加坡被英国统治开始，英语就被确立为新加坡官方语言，是政府行政管理和各种法令、文件的通用语，从此得以名正言顺的在新加坡广泛传播。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就积极推行的双语教育政策，这时的英语成为各源流学校的第二语言。1968年，中小学的数学、科学等理科课程都以英语教授。（王钢等，2010：26）

1979年公布的《吴庆瑞报告书》提出种种对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的基本改革，对后来新加坡人力的培养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可说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分水岭。这是“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概念被提出，“今后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少有降低的制度。”（李光耀，2011：68）1987年是英语地位进一步提升的里程碑，新加坡全国学校统一为英语源流学校，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学计划。

英语在新加坡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新加坡有六大重要用途：一，英语为官方语言。目的为了让各族群有很好的沟通与理解，进而促进一个新加坡共同的国民意识。二，作为教育语言。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中，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三，工作语言。政府部门、法律事务、公众场所和商业活动都以英语作为工作语。四，作为公用语。英语起到了连接新加坡众多种族的纽带作用，种族间和种族内部的交流都可以使用英语。五，作为国家身份语言。英语不属于任何种族的语言。在口头使用中，英语还从其他语言借用了许多独特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因此，英语成了新加坡各族的共同身份象征。六，作为国际语言。英语是新加坡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渠道。新加坡人不仅在自己的群体中使用英语，在对外交流中也使用它。（Low Ee Ling 等，2005：42）

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不可动摇，但也有其危机隐忧。由于早期新加坡由许多外来移民组成，使用的语言均为“外来语”。这些语言经过长期使用自然与别的语言互相“干扰”及“借用”，出现了与原来语言有异的本土化特色，因此便有“新加坡英语”的出现。（郭振羽，1985：68）2000年，为了防止“新加坡英语”广泛的使用，政府发起“讲正确英语运动”（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新加坡英语”是英语一种地域变体，并形成了两种社会变体：新加坡标准英语（Singapore Standard English）和新加坡通俗英语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张艳丰, 2003: 102) “新加坡标准英语”以英国英语的发音和语法为准, 为大多数受英文教育程度高的人在正式场合, 如政府部门或学校使用的口头或书面英语。而“新加坡通俗英语”则属于非正式语体, 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使用者大多数是英语水平比较低的人或者受英文教育程度高的人也会在非正式场合及日常交际之中使用这样的通俗英语。(薛小杰, 2007: 70)

早期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传播和使用的英语就是英国英语, 但随着新加坡多元社会语言特质的融入, 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新加坡英语”。新加坡人民对“新加坡英语”承载着一种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情怀。但是, 新加坡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通过举办“讲正确英语运动”加上政府所有部门、教育机构和社区大力的推动与严格贯彻, 期许新加坡人民讲标准的英语与世界沟通, 恢复新加坡作为国际都市的地位。

无论如何, 英语已经成为新加坡实际上的“国语”, 同时也是种族通用语言、教育媒介语等。新加坡英语已经是新加坡身份的标志。

(二) 母语(华语)的地位

1987年, 当新加坡教育源流统一后, 传统华校的教育模式不复存在。虽然华语失去了教学媒介语的地位, 但华文教育并没有因此消亡, 而是转入了一种存在的模式。如周清华教授所说: “从独立到现在, 华文失去的是

教学媒介语的地位，但从学生的语言背景来看，对大部分新加坡华裔子弟，华语文的教学仍旧是母语或接近母语的教学，而不是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周清海，1998：61）

新加坡政府统一教育源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华语，而是为了推进双语教育政策，保留母语免得丧失本族文化的根源。当母语纳入双语教育后，政府也随着时代的进步，对现有的教育政策作出检讨、调整，以制定一套符合学生程度与兴趣的教学。因此，各个报告书相续出炉，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华语（母语）在双语教育中的地位。

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双语教育开始“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分流教育政策，政府保留了 9 所传统华文学校为特选中学，目的为了培养精通双语（英语+华语）的新一代国民。而其他学校则统一为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华文只以单科的形式存在。（陈之权，2018：85）华文科每周上课的时间和节数大为减少，学生学习与接触华文的时间与机会相对的减少，加上教材也配合着学生的程度而因材施教，程度有降低的趋势。此外，无论在小学、中学和初级学院里，学生所学的华文也极为有限，即使是公民科，也以英语为媒介语。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下学习华文，学生的华文程度自然大大滑落。（杜珠成，2006：79）

目前，华文科的主要功能是传播华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华文人才的主要出路是担任华文教师或在少数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些有限的就业管道着实很难吸引学生投入对华文的学习。若政府能更好地提升华文在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地位，那么华语就能成为国人增值的谋生工具。（吴英成，2010：66）

1999年的《李显龙声明》里其中一个提议是“双语教华文”，即用英语和华语来教华文科目，目的让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及学习华文有困难的学生减少学习华文的初期障碍。这让很多人对这政策持反对的意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字，隔靴搔痒、瞎子摸象、开倒车的做法”。（李光耀，2011：207）毕竟华文教材以华语教导，能更直接有效的达到教学理想，而教师在讲解时也能更准确和透彻。学生已经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接触华文，加上“双语教华文”无形中再减少了学习华文的机会，让华文的地位下滑。

学习任何一种语文学科，都要付出一定的精力与时间才能学有所成。新加坡政府也有实行一些具体的计划与措施来提升华文的地位，让学生对母语有兴趣和热诚。小学方面，华族学生必须修读以华语为媒介语教导的道德教育及好公民科目，这样学生能直接接触到中华的基础文化知识，学做人的道理等，同时也能增加学习华文的词汇。中学方面，中华文学这科，目前只供特选中学特别班的学生选修。此外，中华文学这科在必要时可以加以修订，在不降低原有水准的原则下，快捷班华文比较好的学生也可以修读。初级学

院方面，除了指定其中四所初级学院开设华文语文特选课程外，其他学院也可以效仿提供华文语文特选课程，鼓励更多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继续升造，以培养精通双语人才。（杜珠成，2006：82）

1979 年以来，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作了六次的检讨，其中四次直接针对华文科的教学改革，最近的一次检讨是 2011 年的《何品报告书》（李光耀，2011：178），可见政府对华文教育极重视。新加坡强调华文教育，但并没有要用华文取代英文的意思，发而是要在英文的土壤中发展华文教育。那时的副总理李显龙曾说：“我国在培养精英时，并不希望借此减少新加坡的国际化色彩，或则以华文取代英文，而是设法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语文的环境里，维持和巩固新加坡人的文化和语文根基。”（韦红，2002：31）这也明显表示，新加坡会一直保持英语的原来定位，而母语也将不会改变的居于第二语言的位置。

而李光耀也很坦然地表示：“我们（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从理论上双语看似平等，实际上英文和华文母语根本是不平等的。在小学，英语教学占七成，华语教学只占三成；中学英语占八成，华语教学只占两成；大学英语教学占百分之百。怎么平等呢？”（李光耀，2011：217）所以新加坡的“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也成了新加坡生存之道。

三、影响

李光耀曾经明确地给予回答：“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势力是什么因素所影响呢？第一，天然资源；第二，人才资源；第三，科学和工艺技能。”

（李光耀，1994：131）他认为：“没有自然资源，有人才，同样可以富强，人才资源可以弥补天然资源的缺乏。”李光耀的回答更进一步阐明，只有教育才是新加坡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家发展最有效、最可靠、最务实的工具。作为新加坡教育核心的双语教育，自然也成为新加坡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之源。新加坡的成功与双语教育是分不开的，双语教育是新加坡政治、经济与文化在教育上最具体的表现，它们紧紧相连，相互作用，为新加坡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周进等，2013：71）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日趋成熟和完善，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强国家意识，促进民族融和

双语政策的推行，让越来越多学生成为双语者、双语文化者，让本来以各民族语为基础的认同感转向以英语为基础的认同。选择非母语的中立性语言——英语作为法定行政语言，有利多元社会培养出国家认同，即“新加坡认同”，使人们首先承认“我是新加坡人”，然后才是“我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认同。（黄岳辉，2004：35）这种国家认同的转变，增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尤其指年轻的一代在情感上更贴近新加坡。

2. 提高社会科技，文化水平

英语为主的新加坡社会，让国人都能好好的掌握英语，更能够顺利地直接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加速新加坡的发展。

3. 功能性单语现象的产生

由于过于专注英语，使得民族母语在功能上和地位上受到忽视甚至排斥，令母语的发展就限于口语交际的水平。新加坡听说华语的能力虽然有一定的程度，但阅读和书写华语能力则大大的降低。除了少数精通华文的人士外，多数新加坡年轻人的华文仅限于一般的生活会话。（陈蕾，2006：24）

4. 民族文化的缺失

由于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悬殊，较好地掌握了英语，就能在教育、就业、职位升迁等各方面有优先权，同时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正因为如此，这导致很多华人对母语的学习兴趣缺缺，有些学生应付不来而表现消极甚至憎恨母语。这使得华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5. 华语的提升，方言的削弱

母语为辅，政府的原意是要以母语把民族的文化遗产下去。为了更好的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自 1979 年起就大力提倡“华人讲华语运动”，希望借这运动，方言会慢慢淡出华族的语言圈子。当华人开始注重讲华语而剥削

了讲方言的机会，就给新加坡老人和年轻人带来一些“沟通”上的影响。老一辈的华人本来可以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的华人在这方面就消失了功能。（方小兵，2015：122）为了贯彻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国家概念，华族的方言不得不被牺牲，连同老人和年轻人的“沟通”也牺牲了。

第三节、 强调母语的学习与文化遗产功能

一、母语在文化遗产的背景

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各族文化在相互交融碰撞中生存与发展。正因为全球化使世界趋于大同，大家都变成了地球人，在互相同化的同时惟有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之林中建构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新加坡位于马来群岛中，曾有多国的移民在新加坡生活，后来又受英殖民、日本的统治，这让新加坡在发展的历史轨道中融汇了东西方文化。新加坡的国家发展在方方面面都由受英文教育的精英掌管，那么华族的传统文化不断式微使新加坡逐渐缺少人文涵养及文化标识，成为文化的“浮萍”。（朱海荣，2013：1）

新加坡“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理念，的确让新加坡更快速方便的吸收了国外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技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与开放的国际社会，由于英语让国人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和新观念，这让新加坡的社会生活形态也趋向于西化了。新加坡的发展稳定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新加坡青少年太容易受到西方开放的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为了不让新加坡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观日渐丧失，新加坡政府需要找寻一套能维护稳定和保持社会道德结构的价值观。

李光耀为了把新加坡塑造成有条不紊和拥有良好工作纪律的价值观社会，母语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教授第二语文的价值主要在于传授道德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二语文的教授必须要使学生发生兴趣，并且要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教导华文的最大价值是在于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准则。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思想与信念。这种思想信念是通过故事、传奇以及文化里的神话教给学生，使学生毫不费力的接受。（李光耀，1994：399）

各民族孩子除了在学校学习第二语言（母语）所注重文字的熟练掌握技巧或词意的正确表达，无形中也会吸收本身的文化精神。如华人孩子阅读华人古代半历史半夸张的民间故事、马来儿童懂得他们的谚语和马来民间故事《聪明的小鼠鹿》、印度人的孩子了解《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精

彩故事。这是由于故事内容引人入胜，更含有精神道德的教训，这正是文化的精华所在。（李光耀，1994：400）

世上有很多寓言故事是通过书本和教师不断的重复讲述，里头还包含了精妙的谚语和警句。然而，华文课程里的儒家思想和哲学也包含了在华语、中华文学和中国历史课本里。由于这是老一辈华校教师的教养、训练和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新加坡政府必须在华文教育和儒家思想专家的协助下为学校编写特别的课本，主要的华文片语保留原文，使学生能领略有关思想观念的原来韵味。

母语在文化遗产的功能上，使新加坡国家的发展做到了思想上东方导向与物质上西方导向的完美结合。新加坡不盲目羡慕西方的民族政体，他们以独具东方特色的“托管式民族”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

二、新加坡政府从各层面推动华语的功能

（一）政策

为了提高华人在国内和国际的华语沟通能力，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例如：完全采用中国的汉语标准、1968年成立“简化汉字委员会”、引用简体字、1971年采用汉语拼音、1979年字序排列改为从左到右、1981年成立“标准华语委员会”（Standard Chinese Committee）。提高标准华语文的计划主要有：1999年又增加一所特选中学、在170所幼

儿园开汉语拼音课，在大学开办中华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成立中国语言文化系，与中国大陆 12 所高校签订协议，为新加坡培养华文华语人才等。

（韦红，2002：30）

直到 20 世纪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它的崛起也掀起了中国语言文化热。新加坡政府很快地意识到中新贸易要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培养一批具有高华文水平、对中华文化有深入了解的文化精英。于是政府于 2001 年举办了“华人文化之窗”，共设立了 15 个摊位向民众介绍中华文化，如书法、中国画、陶瓷制作、印章雕刻、大戏服装等，并通过轻松、娱乐性的讲座和表演鼓励华人讲华语，同时让民众了解和欣赏华族的历史与文化。

（黄霞，2013：64）

此外，新加坡政府在 2004 年特别成立了华文课程教学法检讨委员会，并于 2005 年提出，在学校实施新的华文创意教学法，即有效的接触与开发学生学习华文的策略，推出了华文教育的“八要主义”：要注重学生的差异性，为学生制订不同的课程和教学模式；要注重语言的实用功能，对大部分的学生教学注重口语交际和阅读训练；要编写优质、实用、有效的华文教材；要利用资讯科技来提高教学效率；要制定考试制度来提高教学效果；要注重教师和专业人才的培训；要拓展学习和应用华文的机会；要营造一个学与用华文的大环境。（陈蕾，2006：24）

（二）社团

1979年9月7日，“华族使用华语，不讲方言”的决策一敲定，27个民间团体和报馆就举行联席会议，支持推广华语并提出建议。除此之外，相关机构还陆续举办座谈会，如电视座谈会“克服讲华语的障碍”。电台、电视台也停止播放方言节目，或者把原来的方言电视连续剧改用华语配音等。

（黄霞，2013：62）

2006年3月，新加坡中华语言和文化基金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提高新加坡人的汉语水平，让新加坡华裔保留其语言和文化特色，使新加坡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基金会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共同设立，下辖筹款与管理两个工作委员会。这基金会欢迎新加坡相关社团、公司、文化与教育机构为承办各项活动的申请。通过基金会项目的资助下，新加坡政府不断加大了民间华语的推广和教育力度。（陈蕾，2006：24-25）

（三）教育

华文在高等教育中也摆上了重要位置。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义安理工学院均开设了工商华文或商用华文课程。南洋理工大学属下的国立教育学院还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和中文语言文学系，招收研究生攻读硕士博士课程。为了丰富中文系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课业水平，大学里经常举办中国舞蹈、戏剧小组和民族乐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新加坡国立大

学计算机学院还与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以现代化通讯手段推进华文教育。以前华文教育的推进主要靠学校教育，目前华文教育的推进则是可以利用信息通讯技术，通过互联网上的中文学习网站、电视媒体的中文频道以及大量出现的华文报刊，对高级华文课程进行教学辅导。（陈蕾，2006：25）

在新加坡，英文虽已发展为全球化的商业、贸易和科技用语，但不可否认母语才是构成民族价值观、根源和共识的重要部分，它使得各民族可以直接融入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它也使得各民族有能力面对逆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挑战；它是本民族在世界定位中产生潜在自信心的保障，也是保持新加坡人与亚洲社会的特性与共识的象征。

新加坡的成功是东西方优秀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借助于“英语”这一工具性语言，掌握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借助于“母语”这一文化性语言，汲取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东西方文化精华的双重滋养下，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混合文化，它也是新加坡的国家文化特质。

三、母语在文化传承的局限

第一，母语地位降级，功能性单语现象产生。新加坡实施的是一种以英语为主导的非平行双语教育模式，英语的地位被突出。英语是行政用语，是工作机会的保障，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衡量一个人教育程度的标准。新

加坡过度的关注英语，难免使母语在功能和地位上受到忽视或排斥。目前的新加坡，英语是实际的国语，母语只是第二语言的功能。

第二，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1999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张汉音博士在他所做的一个关于文化价值观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华族学生不想做回华人，其中 11.8%想做洋人，8.2%想当日本人，类似情况在其他的马来人、印度人中也大量存在。（徐峰，2008：17）这些人主要是受高等教育，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这可能是华族在新加坡作为最大的族群，缺少少数民族鲜明的自我意识。

另外，新加坡每年都有大量人才外流，大量的留学生学成不归。这类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许多新加坡华人对本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比较薄弱。（白芳等，2007：74）仔细看来，这应该与多年来的双语政策有关，所以可以预见的，如果没有更加切实的推行民族母语教育措施，新加坡的华族认同问题将会更进一步严重。

第三，华文不是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周清海教授指出一般受华文教育者不愿意公开承认的一个事实：“在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社会里，虽然华语的语言地位相当牢固，政府又坚持推行两种语文政策，但无论在行政、经济甚至学术价值上，华语都不能与英语相比。而家长都知道要确保子女有较好的前途，是必须掌握英语的。”（周清海，1986：179）新加坡有个不成

文的现象：受教育越高者、社会成就越大者，都不愿意用华语，使得华语可能逐渐成为不成功人士的应用语言。（周清海，1992：519）

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障碍，造成许多人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华语，感觉说华语者有低人一等的难堪。

第四，华人自身对华语的态度。新加坡人对华语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刘丽宁，2002：78）新加坡建国之后，以英语作为共同的语言，灌输国人“我是新加坡人”的共同意识，让本来整个社会华语水平不高又存在学习华文困难的情况下，华语对新加坡年轻的华族来说只是政府一直宣传要“传承”的语言，是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的升学必考科目，除了华语的经济价值，没有学习的推动力。（李诗奂，2010：16）

基于华语在新加坡面对的种种局限，华人需要调整对华文定位的思维，接受华文的水准和使用范围难以跟英语并驾齐驱，而学习华文的机会不应该局限在课本、课室，而是承载着民族价值观，发扬传统文化的使命。

第四章 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价值观

新加坡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让本来已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依然有机会接受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思想造成极大冲击。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加坡先制定了双语政策，借助英语为工具性语言以衔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借助母语保留东方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了保留优秀的东方文化，让新加坡年轻一代有共同的基本社会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于是政府大力提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新加坡把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一套国家意识，建立起符合新加坡国民的价值观念，即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文化。

新加坡曾经历两次儒学运动，这给新加坡的儒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1877年，中国政府在新加坡确立了领事馆。左秉隆（1881—1891）和黄遵宪（1891—1894）是中国清朝政府直接派到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和总领事，也为新加坡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水仙，2012：37）左秉隆创办了文学团体一会贤社，目的在于培养文风和笼络土人，大力激励诗文比赛。此外，他也极力振兴文教，鼓励办学塾，教材以“四书五经”的背诵和讲解来激发学生对先哲圣贤道德原则的遵从敬仰，使学生熟悉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礼仪规范。1891年，随着左秉隆的离任，会贤社也随之解散，新任总领事黄遵宪也另外组织了性质接近的图南社。（梁元生，2005：19）

在黄遵宪极力提倡文教德化的努力下，新加坡华人社会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回归和仰慕之情。

新加坡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大致以1894年为起点，由中国移民的邱菽园和土生华人林文庆为本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元瑾，2005：125）他们创办报纸以宣扬儒家学说、激励华人拜祭孔像和采用孔历、合办第一间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 School）等。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并不满足这些演讲和诗文活动，他们构想要成立孔庙学堂，将孔庙及学堂合二为一，把儒学变成宗教以取代华人其他信仰，对抗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学堂则兼有研究和培育人才的目的。后来保皇和革命两党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发生斗争，原拟以儒家文化为团结力量的孔庙学堂，也因为受到分化而最终没有成功。（水仙，2012：38-39）

由于中国维新运动的一再失败使邱菽园对康有为非常失望使两者的关系陷入恶化，同时邱菽园卷入保康、保皇的事件而面对清政府的压力。于是在1902年中旬，有关孔子和儒家伦理思想的文章、演说、讨论和会议几乎全部消失，已筹集了20多万元的资金也没付诸行动建立孔庙学堂，儒学运动陷入了沉寂时期。（梁元生，2005：29）之后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受到了史

无前列的批判。二战之后，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更是疏远，国际冷战局面开始形成，而新加坡第一次的儒学复兴运动也宣告结束。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为了实现现代社会而继承了以英语为行政及官方语言，同时面对东南亚反共排华的影响，儒家思想不再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主流思想。新加坡年轻的一代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行为都非常“洋化”，他们不再如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对新加坡老华人作出的评价，“中国移民初来之时，在物质上是赤手空拳的，在精神上却有着深厚的凭借——即中国的文化”。（《星洲日报》，1982年6月7日）为了避免新加坡人失去自己文化的根与东方传统，李光耀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文化系统。

以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社会欲建立一套国家价值观，终归不可忽视中国的儒家思想。如新加坡前教育部长陈庆炎认为：“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要点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制订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时，没有理由不把儒家思想的精华吸收在内。”（王永炳，2005：66）于是新加坡出现了第二次的儒学复兴运动，即“新加坡模式”的儒家文化工程，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弘扬，逐渐深入人心。（侯文广，2010：49）

第二次“新加坡模式”的儒学运动，采取了多项比第一次儒学运动更为具体、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此次儒学运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在中学教育中设置儒家伦理课程。儒家伦理课

程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是由新加坡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1982年，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还亲自去美国纽约邀请著名的华裔儒家学者杜维明、熊介等八位海外儒学专家到新加坡进行考察研究，使得这股儒学风气迅速超越了宗教知识课程的范围并扩大到社会层面。（郭小香，2015：179）新加坡政府为了培养品格高尚的公民，成立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该所积极展开学术活动，还多次主办高规格的儒学会议，以示对儒家伦理课程提供最好的学术支持。

1984年1月，中文版的《儒家伦理》试用课本在15所中学进行实验教学；1985年1月在全国所有中学正式推行。隔年1月，英文版的《儒家伦理》课本试用，1986年1月正式推出在全国中学普遍使用。（刘国强，1991：19）可惜在1990年，新加坡国内的其他族群、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对这项文化重构屡有批评，最终作为宗教知识课程组成部分的儒家伦理课程结束了。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取代儒学伦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列举了五项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观是以儒家思想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是根据新加坡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现代性改造。（郭小香，2015：179）因此，这时期的儒家学说已经融入了新加坡国情的需要，即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成了“新加坡模式”的共同价值观，对建立新加坡人民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得以在新加坡传播，其最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处在东西方文化汇集地，“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万国语，容纳多宗教”而享有世界种族与文化的百花园之称。（孟瑞霞，2011：21）这两次儒学运动的目的是出于对新加坡社会文明建设的需要，欲建立先进文化标尺而努力探索后作出的现实选择。这两次儒学运动有其差异的根本，即第一次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中国意识，注重把儒学宗教化。第二次儒学运动则超越了文化与教育的层面，侧重为国家政治统治寻求理论的支持。（侯文广，2010：49）此外，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是带有民间性、自发性的性质，其最主要传播儒学思想给海外华侨，而这次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基于国际政治因素而自行终止。第二次儒学运动的发起则带有官方和自觉性质，其主要传播的对象是全体新加坡人，而第二次的儒学运动是基于维护新加坡社会与宗教和谐的理由被政府终止的。（高茹，2006：25）

梁元生博士指出这两次的儒学复兴运动的根本差别在于“早期的儒学运动目标在于加强文化认同与爱国意识，精神上则注重儒家的宗教化；今日儒学运动的目标在于加强道德观念，精神上则注重儒家的世俗性。”（高茹，2006：26）总的来说，这两次的儒学运动都为新加坡主流价值观确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李光耀的儒家思想观

李光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有人说他是纯东方的，有人说他是纯西方的。李光耀于1996年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homas John Brokaw）的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产物”。（周加李，2006：69）这无疑与他在新加坡特殊的成长背景有关。李光耀早年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长大，之后继续到英国顶尖的剑桥大学接受法律的专业教育，他精通西方文化与政治哲学，但却有很强烈的东方民族主义情怀。担任李光耀新闻秘书很多年的亚历克斯·佐西（Alex Josey）曾这样形容李光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人把他看成是拥有所有西方优点的人。我认为如果迫于形势，或许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不得不表白他的内心世界时，人们将会发现他是一名优秀的华人，控制着中国海上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岛。”（Alex Josey, 1980：601）

虽然如此，李光耀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华人的后裔而感到自卑或羞愧。尽管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但他从来没抱着崇洋的心理。相反地，他常以自己身为一名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后代感到自豪，“我以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以及数千年不断的有书面历史的后代而感到很自豪。我们的文明是人类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不间断的演变与革新．．．．．”（Alex Josey, 1980：611）大英帝国给了他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就整个知识架构、语言能力、实践水平、做事方法，这对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与其同时，根植在他内心深处的东方民族情怀，是他坚持不放弃本身文化的依据。

但就价值观来说，李光耀从来没有被变成真正的英国人。对于小时候他所受的华文教育颇少，以至于李光耀不能自由运用华文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我讲英语可能比讲华语好，这是因为我早年学的是英语。但是，即使千年万代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也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李光耀，1994：392）李光耀在英国留学那段日子，让他有机会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他能深深地体会人一旦失去本身文化的根基，人就很容易失去自信，会常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所以当新加坡脱离英殖民的统治、被迫脱离马来亚联合邦后，他为了新加坡生存之道，毅然选择英语为各民族的共同语，同时呼吁各民族千万不能放弃本身的母语与文化根基。

李光耀的儒家思想观是并不是他 32 岁立志学习华语时才开始的，这是他从身为华人开始，原生的家庭教育把儒家思想慢慢根植在他的思想里，进而从他生长的环境、文化、教育等也影响着他日后的处事态度与方法。诚如人这种生物不但在物质上有习惯性，在精神层面上也有习惯现象，这个习惯现象受文化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本来就受所处社会的文化影响，忽略了个人对文化反应而欲追寻社会规律，将是徒劳无功的。意思是，人只要过着所处社会文化的生活，他的行为一定符合社会规律。华人的生活，当然受到所信仰的宗教（包括儒家思想）影响。（邱文惠，2013：24）

李光耀对一系列儒家的基本价值，诸如群体意识、勤劳、责任感、任人唯贤、修身、强政府等等从未排斥和轻视过，相反对这些价值观的推崇一直体现在他治国的方略中。（周加李，2006：69）于是，李光耀一直在寻找一种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文化和价值观。为此，他涉猎了大量古今中外大思想家的学说和著作，并进行分析和比较。“我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泰勒和摩尔根关于文化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深刻的历史感去把握的，并肯定他们树立了崭新的文化观点以及对文化力量的挖掘。”（张永和，1994：395）

“身为一个具有中华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政府必须廉洁有效，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育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李光耀，1994：574）

李光耀以坚定的道德信念出发，最后锁定了儒家学说作为新加坡的价值观，并加以极力倡导和推崇。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李光耀在做出充分的分析研究及取其精华之意后，他把以上原有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重新阐释为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儒家思想，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吕元礼，2002：273）新加坡赋予八德的新儒家思想不仅有系统地编成了教科书，而且还成了现今世界上第一个在政治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向全社会弘扬儒家道德为“治国之纲”的国家。（水仙，2012：62）

李光耀赋予新加坡化的儒家新意为：“忠”，新加坡人民要忠于新加坡，要树立公民的国家意识，对新加坡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是‘大我’，个人是‘小我’，而‘小我’的利益要以‘大我’的利益为皈依。”（唐鹏，2010：13）

“孝”，就是要孝敬父母、长辈、尊老敬贤。李光耀把“孝道”视为国民伦理道德建设的起点，并指出孝道的根本在于孝敬父母。他于1981年2月3日在华族新春献词时强调延续华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更指出奉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新加坡年轻的一代不该学习西方社会，把家里的没有病弱或须要特别护理的老人委托给政府或商业机构，应该学习拥有亚洲传统和价值观的日本，他们并没有把老人安置在老人院。若子女履行晚辈照顾长辈的责任，这样才不会危害了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也等于保留了东方的传统。（李光耀，1994：407-409）

“仁”，即“仁爱”或“仁慈”。所谓“仁爱”，李光耀认为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美德核心。所谓“仁爱”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要有同理心及友爱精神。（朱春珠，2004：153）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他呼吁各社群要友爱、团结和睦，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有“人情味”的国家。

“礼”与“义”，即“礼义”。“礼义”也是讲究礼貌的意思，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这与传统儒家所重视的等级之礼有不同之处。（贺

对达，1994：24）李光耀认为礼貌分为两方面，即形式和诚意，“形式能帮助我们调节社交，减少相处时格格不入和磨擦的现象。形式包括语言和姿态。然而，真心诚意比形式更重要。不论是谈吐或举止，我们必须诚心照顾别人的自尊、自重和福利。”（李光耀，1994：402-403）

“廉”，就是清明、廉洁。它是执政者的基本德行，更是做官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廉是立国之本，清为当政之根”，他要求新加坡的官员要树立为国民服务的思想，为民众牺牲奉献的精神。这样廉洁和稳定的政府，才有威信，才能取信于民。（朱春珠，2004：153）为了遏制公务员腐败的念头，新加坡不断提高公务员的选拔条件、对在籍公务员制定严格管理制度。为了降低公务员的贪污受贿的概率，新加坡还实行以俸养廉政策，让公务员有高工资、高待遇的优厚福利。（任蕾蕾，2014：24）

“耻”，即指人们的羞耻之心。羞耻之心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之一。“羞耻”为“知耻”为前提。李光耀主张应该在新加坡国民中大力提倡“知耻之心”的教育，增加人民明辨是非的观念，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修养。借此树立社会的新风尚，建立一个有文化素养的社会。（朱春珠，2004：153）

以上“八德”，李光耀把它视为新加坡政府必须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毕竟新加坡是多元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适宜一味强调儒家思想的

作用，还得顾及马来族群、印度族群的思想、观念和情绪。（贺对达，1994：24）之后于1988年10月，继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李光耀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把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并进而发展到在新加坡树立和贯彻的“共同价值观”。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就发表了五大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这五大价值观白皮书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朱春珠，2004：153）白皮书明确指出儒家文化传统与遵行“共同价值观”并无冲突，可见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继承和发展。

不管是新加坡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还是升格为五大价值观白皮书的确立，都是以结合了新加坡国情为基础。传统的儒家思想需要和其他伦理观念与精神融合，从中取得调和，这才是真正属于新加坡式的儒家文化。

第二节、从新加坡教育政策推行儒家伦理课程

双语教育是新加坡教育的一大特色。以往，英语一枝独秀的情况给新加坡双语制前景及新加坡社会带来严重问题。李光耀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尽管自己英语讲得比华语好，但内心并没有西方的价值观体系，有的是东方的

精神价值体系，永远不可能成为英国人。（沈平等，2010：86）如果不推行双语政策，新加坡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会逐渐出现“代沟”、不赡养父母的现象日益普遍、勤俭自律的美德会淡化及道德沦丧。这都是由于人民失去了母语也就失去了民族的根，东方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也会跟着沦丧。于是加强母语教育，弘扬传统价值观，成为了新加坡力挽狂澜的现实课题。

在极力追求工具语言和文化语言平衡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接受不是所有学生都具备高水平双语能力的事实，所以就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和工作语言为基础，让母语文化承担社会教化，以期塑造民族历史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功能。而对于语言不同功能的分工和认定，也确实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政策确立了文化传承和延续传统的基础。

所以教授华语的意义恰恰在于保持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文化精神，对于主体民族的华人而言，华文教育的最大价值诚如李光耀所说：“在于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准则。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思想和观念。”（李光耀，1994：399）

于是自1980年开始，新加坡教育部对全国中、小学道德课程进行评估，并规划在学校的正规教育课程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以灌输年轻一代儒家的价值观念，从而抗拒社会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与道德危机。

（邱文惠，2013：34）1982年，新加坡政府宣布要在学校开设有关儒家伦

理的课程。随后 1982 年的下半年，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邀请了 8 位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儒家学者参加新加坡的儒家文化教育研究，并多次召开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国际会议。1985 年，新加坡中文版的《儒家伦理》课本开始在全国中学使用。新加坡是第一个把儒家文化编纂成课程教材来学习的国家，这举动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一位学者指出：“我们的振奋在于，儒家伦理能够直接进入课堂而且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教材，儒家伦理能够直接为现代人的道德培育起作用。作为儒家文化思想的发源地中国，还没有像他们这样做。”（龚群，2007：34）

1985 年，在新加坡全国开始运用的《儒家伦理》课本的内容与新加坡的基本国情、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新加坡政府要各民族互相合作、和谐共处，一同建设有共同意识的新加坡人民。于是，新加坡政府在宣传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宣传其他宗教文化，让人们关心传统的亚洲价值观而不是单单的儒家文化。（王园园，2013：34）

以下是简略新加坡实施儒家伦理课程的进度（邱文惠，2013：34-35）：

（一）1982 年 1 月 16 日，教育部宣布将在中三、中四实施“宗教教育”课程。

（二）1982 年 2 月 3 日，教育部宣布将在“宗教教育”课程中增加“儒家伦理”一科。

（三）1984 年 1 月，“儒家伦理”华文课本在全国中三班级开始全面试教。

(四) 1986 年 1 月起, “儒家伦理” 华文、英文版教材全面在全国中三、中四实施教学。

(五) 1989 年 12 月 31 日, 终止实施宗教与儒家道德教育课程。

(六) 1990 年 1 月, “宗教与儒家道德教育课程” 改由公民道德课程取代。

当新加坡政府确定了要以儒家思想传播社会行为和道德行为准则, 从 1980 年的规划至 1982 年宣布在“宗教教育”课程中增加《儒家伦理》这科。虽然《儒家伦理》纳入宗教课里的其中一科, 但它肯定不是一种宗教信仰, 更多的是培育道德行为准则的意义。由于政府在教学之外也鼓励其他与儒学有关的文化及社会活动, 成功引起社会各界热烈的反应, 同时也引发了其他民族与邻国的担忧与不安。终于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 《儒家伦理》与宗教的课程终止停办, 取而代之的是公民道德课程。新加坡宗教知识教育的终止, 令儒家伦理课程也跟着销声匿迹, 让人误以为宗教与儒家道德教育是失败的, 其实不尽然。其背后的意义不止于道德教育, 而是蕴含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卓福安, 2010: 59)

其实在 1982 年, 当政府决定在中学引进必修的宗教知识科后, 各民族忧虑政府可能会把“儒教”(他们误把儒学当成一种宗教)强加在他们身上, 于是各宗教派开始炽热地传教, 这样的趋势起了根本上的变化。这是由于回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基督教加强传播福音, 连传统宗教如佛教, 也恢复积极活动, 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无形中各宗教派的分歧有越来越大的形势。如

果不拿捏好炽热的传教趋势，这可能会瓦解新加坡宗教和谐与宗教容忍的传统。”陈庆炎博士指出：“政府在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实行强制性的宗教教育使政府无法在宗教事务上保持完全的中立，令人产生一种印象，政府是对某些宗教给予特别的地位，或它让某个宗教使用政府及政府支援的机构如学校，来协助他们传教，这与政府要在宗教事务的处理方面保持中立和平等的愿望相违。”（王永炳，2000：58）

终于在1989年，新加坡政府决定采取立法措施来维护宗教之间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停办《儒家伦理》课程。后来于1991年2月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号召各族人民共同遵守“五大共同价值观”。这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国家为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以这五个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新加坡于1992年开始在小学使用《好公民》和中学的《公民与道德》教科书取代了之前的《儒家伦理》课程。（赵少华等，2007：68）自此以后，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如尊重、责任、正直、关怀、容忍、和谐等德目，只能制定在公民道德教育课程里，以渗透的方式让学生学习。（谢彦波，2009：41）

小学《好公民》教材根据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公民道德教育划分为六个层次，即道德教育由学生个人开始，逐渐扩展至家庭、学校、邻居以至世界和全人类。中学的《公民与道德》课程是对小学课程的补充，分为公

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态度三方面。这些课程由课本、作业和视听，同时辅之以社会实践等内容组成，由浅入深，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且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学校公民教育体系。（赵少华等，2007：68）

这样看来，新加坡通过在学校和全社会推行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伦理，对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道德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影响，使新加坡不仅以经济发达著称，更以治安有序、文明礼貌、美丽卫生令人惊叹。（王冬艳，2002：105）同时可以发现，儒家伦理从华人传统价值观发展到各族群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实现了抵御西方不良风气，又能建立一个繁荣又和谐的国家。

第三节、儒家文化价值观对新加坡的影响

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在民间早已流行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它摆脱了封建文人的影响，传播了仁爱精神、民族意识等积极方面得到了发扬，这是新加坡儒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新加坡儒家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当初为了建设《儒家伦理》这门课程，新加坡还特地从美国和台湾请来了杜维明、余英时等 8 位教授前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大众传媒也配合进行宣传，使推广儒家伦理的活动造成巨大的社会

影响，一个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维护传统价值观的运动说明了新加坡对儒家伦理重视程度。因此，儒学在新加坡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政府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推广，是为第三个特征。（王文钦，1996：95-97）

1991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并较成功地构建和传播了这一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具有东西方元素交汇、传统与现代整合的特点。它既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家，社会，家庭对于个人的优先地位以及整体主义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提倡各人自由独立、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并兼容现代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新需求，强调协商、共识、稳定和宽容的精神。（陈德，2015：60）

学校是共同价值观教育最重要的主阵地。新加坡从小学到中学都开设了《好公民》和《公民与道德》等专门的教育课程。其目的是为了重点培养学生的国家与公民意识、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意识、宽容和合作意识等，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采用实用性、操作性强的教育方法，避免空洞说教。新加坡小学公民道德目标是：向学生灌输适合新加坡的东方道德价值观；训练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教导学生处事待人须为他人设想的道理；使学生明白身为年轻公民的责任。新加坡中学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高尚之品格，善良之性情，矫健之体魄，优良之习惯，爱国爱民之意识及各民族互

助合作之精神，以期成为完好优秀之青年，成为国家和社会之中坚。（赵少华等，2007：61）

一、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个人的影响

儒家文化重视修己爱人，强调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提倡“慎独”、克制、自我修练等，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有一个深刻的精神层面”。（王芳，2011：34）这是启发每个人内心的自觉。此外，新加坡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所以学校的德育教材里渗透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在德育教育中提倡把新加坡特色与传统美德结合的教育，即是培育“新加坡人”的共同意识。为了培育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学校规定每天要举行升旗礼、唱国歌和背诵信约，以培养学生有牢固的国家意识。（王学风，2002：63）正因为国人受益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德育教育的公民意识，新加坡人民拥有高度自制和自觉的精神，继而让国民素质提高之余，社会也更井然有序。

二、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家庭的影响

新加坡政府对家庭教育格外的关注，强调家庭的意义，倡导“家庭为根”的价值观念，促进家庭功能的发挥，形成了“亲爱关怀、互尊互敬、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为主要内容的新加坡家庭观念。1995年《赡养父母法》获得新加坡国会通过，并于1996年6月1日生效。这是新加坡第一个由国会议员提议而不是由政府提议通过的国会法。（徐振华等，2012：151）为了增强子女的家庭观念，有自觉地承担对家里老人的赡养义

务，政府还以利益为导向，把赡养老人同购买或租赁组屋挂钩，规定年轻的单身男女不得购买或租赁组屋，如与父母或四、五十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同住，条件可适当放宽，如三代同堂可优先解决住房问题。建屋局还特意设计了三间一套和一间一套的新组屋，便于新婚夫妇照顾老人。（马志刚等，1993：114-115）这样的立法，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新加坡政府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价值观的决心。此外，政府也通过社会组织展开尊老活动，使老年人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关怀。可见新加坡的家庭价值观教育效果显著，家庭成为建立社会凝聚的基础，“家庭为根”成为新加坡人的理念和共识。

三、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社会的影响

李光耀直接说明新加坡推行儒家思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民过度西化。由于新加坡政府认为过度西化的社会将产生道德危机及衍生社会问题。于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重建东方价值观的社会宣传活动：从1979年6月开始，新加坡更是的活动，如：1979年6月开始第一次全国礼貌月活动，以后每年举行。1979年11月开始举办敬老周活动，至今每年举行。这些活动表明了李光耀对传统价值观的重视由零散的鼓励行为变成集中的政府行为。（王文钦，1995：110）上述由政府推动的社会运动，都围绕着重建东方价值观的目标，让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有更多实景与机会认识礼貌、孝道，以建立优良的社会风气。

四、新加坡的儒家伦理对国家的影响

新加坡政府以儒家价值观来重建文化思想，让华族找回自己文化根源的工具，同时避免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因此，新加坡制定相关政策，如加强对外国和本国的传播媒介管理，坚持把黄色文化拒于国门外、采取重罚，惩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对外国人也不姑息。（贺对达，1994：25）新加坡国民讲文明讲礼貌守秩序、新加坡社会公开透明规范、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管理科学，这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新加坡融入了中西方的法治精神、东方儒家传统美德及现代科技技术监督保障，这就是新加坡拥有良好社会风气的凭据。（谢彦波，2009：43）

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本研究的重要论点与发现

李光耀来自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的家庭，童年时他印象最深刻的语言，除了英语就是马来语和爪哇语。在他的成长岁月里，家庭、学校、留洋，甚至日据时代学习的日语，到后来成为新加坡总理需要以福建话、客家话对选民演讲，这样的经验与感受都深深刻印在他的脑海里。这样的经历让李光耀对学习语文有自己一套的看法和态度，甚至影响了他日后制定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政策。

李光耀留学英国时经常出入伦敦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的中国协会（China Institute），这让他有很多机会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那种不会讲华语或听不懂华语的严重文化失落感，激发了他一定要保留文化的根，“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人就会变得没有自信心”。

（李光耀，2011：52）这段时期让他有“重新找回华人身份”（born-again Chinese）的感觉，影响他日后孜孜不倦学习华文的推动力，甚至成为日后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推手。

很多人评价李光耀是典型中西合璧式的文化人物。这基于他祖辈家庭源自于中国古老的客家族系，并且在一个浓郁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另一方

面源自于他自小受“英国式”的西方文化教育，特别是作为从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极具西方现代观念。这使得李光耀能够在浩瀚的东西方文化的海洋中遨游，纵横捭阖，从而获得了宝贵的经历和价值观的因素。

（朱春珠，2004：153）

李光耀的语文观与他中西合璧式的文化精神是开启新加坡双语教育之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1819年，英国的莱佛士登上新加坡这个海岛以先，华文私塾、马来文私塾及淡米尔文私塾的单源流传统学校已经林立，由民办教学，各自为政。英殖民统治者对各源流传统学校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给予津贴与帮助，也不干扰民办私塾的课程或媒介语，任其发展。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时期的英语与母语教育都是私塾的主要媒介语，它们的地位都是平等，平行的。

根据资料显示在1875年，新加坡最早出现的双语学校—Cheang Hong Lim School，主要教授中英文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1947年，一位开明的英国牧师齐来亚（Rev Canon D. D. Chelliah）正式提出双语教育，建议让单源流传统学校加入一门英语科目，这样比较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英语已经是新加坡的官方行政语言，可惜这建议没被接纳。一直到了1959年，新加坡得到了自治的主权后，依据《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肯定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重要和母语教育的地位，即是平等对待各源流传统的学校，学生以各自的母语为教学媒介语，并且修读一

门英语科目。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时语言教育是“母语为主，英语为辅”。经过了 20 年的双语教育，新加坡人的双语能力达不到成效，经过一番检讨及研究，《吴庆瑞报告书》于 1979 年正式宣布“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这是新加坡双语教育之路的分水岭，对之后国家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自新加坡 1965 年独立以来，双语教育的教学改革分成了 5 个重要的阶段。而 1979 年《吴庆瑞报告书》公布后，新加坡在教育制度上作了六次的检讨，其中四次直接针对华文科的教学改革。（李光耀，2011：178）那么这五次对华文科教学的改革研究是：1979 年的《吴庆瑞报告书》突出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及双语教育的分流体系。1992 年的《王鼎昌报告书》最主要的贡献是把华文第一语文称为“高级华文”，华文第二语文称为“华文”；把华文传统教学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重视学生书写能力，转移到读、听、说。（李光耀，2011：193）1999 年的《李显龙声明》主要以“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政策重新编写课本来帮助华文程度特强、特弱及一般的学生；正式提出为华文程度差的学生制订一套“华文 B”课程，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华文。2004 年的《黄庆新报告书》延续“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教学法，还把“灵活”和“乐趣”的元素加入教学法。这是李光耀第一次全程参与的“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被称为“前所未有、深谋远虑、朝向明天”的改革方案。此报告书按照学生的能力，设立了四种“单元教学法”——导入单元、强化单元、核心单元及深广单元。最近一次的改革报

报告书是 2011 年的《何品报告书》。这报告书除了调整教学方法外，也允许以高科技来改变考试的方式；增加拨款打造良好学习母语的环境、增聘母语教师，为了实现“乐学善用”的愿景。可见，新加坡的华文一直受到教育部的重视，政府坚持新加坡人学习双语，即保留英语的“工具性”及华语的“文化性”，这样新加坡人不仅能保留自己的传统同时也能与世界并进。

李光耀治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和精髓在于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推广东方文化。在文化教育上，他坚持实行双语政策（Bilingual Policy），确保新加坡人能以英语作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各民族交流的工具的同时，又能掌握母语，以免失去传统文化的根基，迷失前进的方向。他深谙和谐社会对岛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鼓励各组群发扬本身文化、保留亚洲人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强调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各民族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便有了平衡的价值观-这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王少军，1997：48）

到了 80 年代初，新加坡在世界各国中的经济发展快速，以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领导人为本国的经济增长率感到自豪的同时，面对社会越来越“洋化”的趋势感到忧虑。李光耀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对这种倾向无动于衷，我们一方面将失去曾推动我们前进和成功的传统价值精华，另一方面则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全然不利于我们的价值观”。（贺对达，1994：23）基于这样的忧虑，李光耀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适合新加坡文化与国情的

价值观，最后他锁定了儒家思想。经过重新阐释调整，整理了一套新加坡化的儒家思想，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以上“八德”，李光耀把它视为新加坡政府必须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这八德还被编入了课本《儒家伦理》，政府主办的儒家研讨会、推行的儒家运动等，风头一时无两。直到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与邻国的担忧，他们误以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信仰，会威胁他们本来的信仰。

为了不破坏新加坡社会的宗教和谐，1991年2月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号召各族人民共同遵守“五大共同价值观”。这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国家为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以这五个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新加坡于1992年开始在小学使用《好公民》和中学的《公民与道德》教科书取代了之前的《儒家伦理》课程。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如尊重、责任、正直、关怀、容忍、和谐等德目，只能制定在公民道德教育课程里，以渗透的方式让学生学习。儒家伦理从华人传统价值观发展到各族群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实现了抵御西方不良风气，又能建立一个繁荣又和谐的国家。

面对新加坡的地缘政治因素，为了与世界接轨，为了求存发展，为了保留民族的自信和文化认同，双语之路是最好的出路。新加坡的双语之路，其实也是李光耀的双语之路。李光耀曾指出他自己这大半辈子，学了六个半语言，英语、拉丁文、日治时期自学的华语（算学了半个语言）、日文、3

2岁开始读听写说华语、福建话及客家话。为了学好着六个半的语言，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以他的语文观、经历及研究精神，对于新加坡双语政策的立场坚定不移—英语为主，母语为辅。新加坡人的优势依然在于懂得英文，而学习华文仍然为了文化传承。对于华族的文化传承，首先从双语教育政策着手，通过改制华文的程度、编制因材施教的课本、走入实景社会打造良好母语的环境，让国人愿意主动热切的学习本身的母语。

此外，新加坡的语文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因着英语的提升，连带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也一并冲击着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一直以身为华人自豪的李光耀，保留了儒家思想传统中的精华成份并加以适当选择去芜存菁，确立了新加坡化的“八德”，再把“八德”的理念渗透到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这“共同价值观”培育了新加坡国民的高素质、社会公开透明规范及政府廉洁高效率。这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新加坡在国家发展上，做到了西方物质导向与东方思想导向的完美结合。

总的来说，李光耀一辈子都在摸索双语教育的哲学以及填补他内心那份失落的华族文化价值观。他于1991年10月13日在丹戎巴葛的午宴上致词说：“今天我会比三十、四十年前更华族化，这是因为我这些年来学习华语和多看华文读物的结果。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明白人类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吴元华，1999：136）

第二节、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李光耀的语文观与双语政策对推行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揭开李光耀在民族精神层面上保留的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李光耀亲身经历了英殖民时期、日治时代、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到被迫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加坡人，他拥有多语的能力与丰富的语言经验。当“英语为主，母语为辅”被提出前，方言对李光耀来说有过特别意义，因为方言是“竞选语言”，是赢得选票的重要武器。那时候的新加坡华人，很多是福建籍贯的，于是李光耀努力学习福建话，以福建话发表公开演讲。到了1963年大选，李光耀已经能说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话，甚至还能引经据典。

（李光耀，2011：144）意想不到地他可以为了更好推行双语教育（英语+华语），他决定以身作则放弃了他20年来说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还积极推动“华语运动”，鼓励新加坡人放弃方言。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冒险的，他宁愿背负这样的冒险，因为华语和方言只能二选一：华语能传递文化价值观而方言则属于地方性的语言并且有它的局限。李光耀当机立断的斩断与福建话的情谊，全新投入以英语和华语为主导的双语政策。由此可见，李光耀愿意为新加坡国民树立一个讲华语的榜样而放弃了政治资本（方言-福建话）。这说明了李光耀维护华语，以维系中华文化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李光耀所推行的双语政策是重英语，轻华语。

双语政策让新加坡人有更多机会认识另一种国情文化，打破世界的隔阂。由于英语在新加坡社会地位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 1987 年后，新加坡全校都以英语为媒介语，除了特选中学的英语和母语都是第一语言的程度。华语在双语教育中，经过 4 次的改革，可看到华语在教学的程度里越来越低，只涵盖“听”，“说”和“读”的部分，淡化了“写”的部分。原本的严格华文考试被“乐学善用”的措施取代，这给人带来了双语政策越来越轻看华文的感觉。尽管如此，新加坡还不至于完全放弃华文教育，而且“乐学善用”的措施可能对推广华语在新加坡的应用有正面的效果。此外，新加坡也重视培养华文精英，政府保留特选中学、投入大量的基金建华语研究院、派发奖学金等，以确保不会失去掌握高水平华文的人才。

人们总是认为新加坡失去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总是把中华文化局限于传统价值观、儒家文化、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经典等。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不断被消解，目前秉持对传统文化热诚的多为年长人士，特别是在华族的戏曲、文史等场合，往往是两鬓斑白者较多。从华文报纸的角度说，华族社会往往流传着“死掉一个老华人，就少卖一份华文报”，这是新加坡当代华文及华人文化认同的真实写照。（朱海荣，2013：7）人们认为华族社会在这现代和多元社会中逐渐走向衰弱的悲哀，却忽略了真正主导民族的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去粕取精，去芜存菁，保留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维护家庭及效忠国家的精神意义。新加坡提倡的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文化。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就把儒家“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八德变成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而李光耀还把这八字赋予新的含义。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文化不断地被调整与重塑，新加坡特色的儒家思想成功转型为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值得重视的是，李光耀本身的语文观催生了双语教育的政策，新加坡人不仅仅懂得自己的母语（华语），还能精通双语——英语和华语，此外政府一直提倡的新加坡化儒家思想，更使得新加坡国民能保留中华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重要意义。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对华语文的基本运用于保持，成功地保住了华族文化的“根”和继续让华语文发展其巨大的潜力和动力。这让新加坡颇具争议性的“有语有文”得到很好的论证。新加坡的“有语有文”是在国家、国民利益的考量下，保留了民族的语文与文字，还同时保留了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儒家文化。“有语有文”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新加坡成功的重要精神支柱。

本论文实为通过文献、历史来进行论文研究与分析。从中看出李光耀的语文观、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及新加坡的儒家思想观对新加坡人民的影响。本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田野调查，未能走入新加坡群众作出问卷和访问。毕竟李光耀的“理想政策”与新加坡国民的感受与影响是有差异的。笔者期许之后有机会可以走入民众做田野调查，根据李光耀的“理想政策”

及人民的体验感受作出比较研究，试图理出当中的吻合度和差异度，以作出更实践性的政策，惠国惠民。

引用文献

- 安妮·福斯特、李华（1984），〈“吴庆瑞报告书”反映了新加坡教育制度在政策上的不断改革〉，《东南亚研究》（2），17-21。
- 白芳、淦家辉（2007），〈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得失对中国双语教学的启示〉，《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3)，73-75。
- 蔡志礼（2006），《学语致用：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新加坡：汕头大学出版社。
- 陈鸿瑜（2011），《新加坡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 陈经源（2001），〈华文教育与教学的变迁：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二集》。
- 陈蕾（2006），〈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八桂侨刊》（4），24-25。
- 陈莉（2010），〈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加坡双语教育探析〉，《外国教育研究》（3），91-96。
- 陈偲（2015），〈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建设经验〉，《理论导报》（7），60-61。
- 陈文、梁茂春（1996），〈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新加坡的实践〉，《孔子研究》（4），118-123。
- 陈志刚（2013），〈历史研究法在教育研究运用中应注意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6），76-80。
- 陈之权（2005），《新加坡教育分流下华文课程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及改革策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 陈之权（2008），〈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谈当前新加坡华文课程的文化成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5-91。
- 陈之权（2013），〈新加坡独立以来各阶段华文课程与教学改革重点及其影响评价（1965-2010）〉，《中原华语文学报》（11），73-97。

- 陈之权（2018），〈多管齐下加强华文教学：新加坡的实施方略〉，《华文世界》（122），84-102。
- 董淮平（1998），〈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文化认同〉，《求是学刊》，1-1。
- 杜晓利（2013），〈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上海教育科研》（10），1-1。
- 杜珠成（2006），〈新加坡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承传关系〉，《海外华文教育》（2），78-82。
- 方小兵（2015），〈新加坡“讲华语运动”与华语方言的消失〉，《生活教育》（21），121-123。
- 冯增俊、柯森（2003），《双语教育与综合英语》，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高茹（2006），《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以新加坡两次儒家伦理思想复兴运动中的伦理教育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
- 高茹、刘振平（2014），〈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中因材施教理念的注入与发展——新加坡教育政策报告书解读〉，《外国教育海外研究》（3），22-32。
- 龚群（2007），《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管华（1995），〈略论政策的科学性与宣传的正确性〉，《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2），8-9。
- 郭小香（2015），〈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政治解读〉，《理论月刊》（10），177-182。
- 郭振羽（1985），《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贺对达（1994），〈儒家学说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学术探索》（6），23-25。
- 黄海涛（2002），〈试论李光耀的儒家思想文化观〉，《楚雄师范学院学报》17（1），63-66。

- 黄明 (2007), 〈浅析新加坡英汉双语教育政策〉, 《中国教育学刊》(4), 21-24。
- 黄明 (2008), 《新加坡双语教育发展史——英汉语用环境变迁研究(1946-2006)》, 厦门大学。
- 黄松赞 (1984), 〈新加坡的两种语文教育〉, 《东南亚研究》(3), 57-63。
- 黄松赞 (2005), 《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研究》,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 黄霞、游汝杰 (2013), 〈华语运动与新加坡的语言使用考察〉, 《西部学刊》(12), 61-66。
- 黄岳辉 (2004), 〈略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外国中小学教育》(6), 34-37。
- 侯文广 (2010), 〈从边缘到主流:新加坡儒家文化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3), 48-51。
- 柯永红 (2009),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语教育政策之比较〉, 《东南亚纵横》(10), 48-52。
- 李光耀 (1994), 《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 新加坡: 新加坡联合早报。
- 李光耀 (1998),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新加坡: 新加坡联合早报。
- 李光耀 (2000), 《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 新加坡: 新加坡联合早报。
- 李光耀 (2011), 《李光耀: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新加坡: 新加坡联合早报。
- 李诗兔 (2010), 〈新加坡华语发展现状及成因综述〉, 《海峡科学》(9), 15-17。
- 李世家 (1995), 〈儒家价值观取向与新加坡文明〉, 《探索》(3), 58-61。

- 李阳琇（1999），〈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及其社会效果评析〉，《现代教育论丛》（3），48-52。
- 李怡静（2016），《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加坡英语研究》，成都理工大学。
- 李元瑾（2001），《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 - 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李元瑾（2005），〈从新加坡两次儒学发展高潮检视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中国哲学史》（3），124-128。
- 李章吕（2008），〈论演绎法与新知〉，《科学咨询》（11），42-42。
- 《联合早报》（1999年1月21日），〈李显龙：政府宣布培养华文精英政策让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
- 《联合早报》（2004年8月22日），李显龙：李总理国庆演讲全文。
- 《联合早报》（2010年5月12日），〈黄永宏：成立母语教育检讨委员会是重视而非削弱双语政策〉，母语教育总理记者会。
- 梁元生（2005），《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林方榕（2008），《新加坡双语教育发展历史研究与启示》，福建师范大学。
- 刘国强（1991），〈从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产生的一点感想〉，《鹅湖月刊》（187），19-21。
- 刘丽宁（2002），〈80年代初至今新加坡华语使用状况分析及展望〉，《东南亚研究》（5），76-80。
- 刘培栋（2006），《战后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暨南大学。
- 刘延超（2012），〈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困惑——新加坡英语文学中的身份认同困惑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2），55-59。
- 罗爱梅（2003），〈新加坡双语教育课程极准及实施〉，《课程·教材·教法》（6），59-60。

- 骆秀红（2009），《二战后新加坡华文教育兴衰及原因分析》，暨南大学。
- 吕元礼（2002），《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海玲（2009），〈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3，149-150。
- 马志刚、刘建生（1993），《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北京：群众出版社。
- 孟瑞霞（2011），《儒家伦理与新加坡家庭价值观教育研究》，西北师范大学。
- 《南洋商报》（1982年2月3日），〈内政部高级政务次长钱翰琮呼吁：国人必须重视建设文化道德、人文精神〉。
- 潘家福（2008），《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研究》，复旦大学。
- 邱文惠（2013），《新加坡实施宗教与儒家道德教育之探析》，台湾：真理大学宗教文化与组织管理学系。
- 任蕾蕾（2014），《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研究》，西北师范大学。
- 阮岳湘（2005），〈新加坡华语运动和华人文化认同〉，《广西社会科学》（6），185-187。
- 沈平、洪明（2010），〈李光耀与新加坡华文教育〉，《海外华文教育》（4），84-88。
- 石淑琴（2015），〈李光耀的毕生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文史天地》（6），77-81。
- 水仙 Namthip Arthabowornpisan（2012），《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社会的体现》，浙江大学。
- 宋明顺（1980），《新加坡青年的意志结构》，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宋若云（2013），《新加坡教育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宋旺相（1984），《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牛津大学。
- 宋占美（2007），《新加坡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发展》，山东师范大学。
- 苏瑞福（2008），〈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南洋资料译丛》（4），39-58。
- 孙汝建（2011），〈华文教育的现象与本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0-75。
- 孙天慧（2017），〈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读天下》（3），357-357。
- 汤姆·普雷特（2011），《李光耀对话录：新加坡建国之路》，北京：现代出版社。
- 唐鹏、张强、唐荣双、韦美珠（2010），《新加坡的公民道德建设》，北京：民族出版社。
- 汤云航（2008），〈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概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8（1），1-10。
- 佟毅（2010），〈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新疆职业大学学报》18（3），62-65。
- 王冬艳（2002），〈儒家道德观对新加坡道德教育的影响〉，《北方论丛》（3），103-106。
- 王芳（2011），〈新加坡对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倡导〉，《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4（2），33-38。
- 王钢、贺静（2010），〈基于语言生态视角的新加坡英语探究〉，《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7（3），25-28。
- 王丽（2010），〈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民族性和经济性〉，《比较教育研究》（11），63-67。
- 王少军（1997），〈李光耀治国的特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45-51。
- 王文钦（1995），《新加坡与儒家文化》，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 王文钦 (1996), 〈新加坡儒家文化三特征〉, 《社会学研究》 (4), 93-97。
- 王学风 (2002), 〈新加坡中小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及启示〉, 《外国教育研究》 29 (8), 60-64。
- 王学风 (2003), 《新加坡基础教育》,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 王艳萍、黄明 (2011), 〈浅析新加坡英汉双语教育分流制度〉, 《沈阳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3 (6), 13-16。
- 王永炳 (2000), 《公民与道德教育——世纪之交的伦理话题》, 新加坡: SNP 综合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 王永炳 (2005), 《挑战与应对-全球化与新加坡社会伦理》, 沈阳: 友联书局。
- 王园园 (2013), 《基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儒家文化教育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 韦红 (2002), 〈新加坡语文政策的调整〉, 《教师教育论坛》 14 (5), 29-32。
- 吴英成 (2010),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沿革与新机遇〉, 《台湾语文研究》 5 (2), 63-80。
- 吴元华 (1999), 《务实的决策: 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1965》, 新加坡: 联邦私人有限公司。
- 吴元华 (2004), 《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 新加坡: 创意出版社。
- 谢彦波 (2009), 〈新加坡以儒家伦理开展学生德育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3 (36), 38-47。
- 谢译文 (2006), 〈从报告书看近年来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改革. 新加坡华文研究会〉, 《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四集》, 新加坡: Panpac Education Private Limited。
- 新加坡教育部 (1955), 《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 新加坡。

- 新加坡教育部（2004），《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
- 《星洲日报》（1982年6月7日），〈余英时：新加坡推行儒家思想之我见〉。
- 徐峰（2008），〈新加坡华语地位的变迁与华文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现代中文学刊》（6），13-19。
- 徐静（2015），〈新加坡：双语教育成功的典范〉，《世界教育信息》（11），8-9。
- 徐平莉（2017），《新加坡华语文教育政策与华文测试的关联研究》，暨南大学。
- 徐雪瑛（2009），〈新加坡华文教育述评〉，《外国中小学教育》（11），62-65。
- 徐振华、胡昔用（2012），〈新加坡《赡养父母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9），151-155。
- 薛小杰（2007），〈新加坡英语管窥〉，《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7（3），70-75。
- 詹伯慧（1988），〈新加坡的推行华语运动〉，《语文建设》（6），30-36。
- 俞可（2015），〈李光耀的星岛〉，《上海教育》（32），37-37。
- 袁锐锷、李阳琇（1999），〈论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外国教育研究》（4），50-53。
- 张晓昭、孙忠宝（2009），〈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新加坡的教育政策〉，《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093-1098。
- 张学智（1998），〈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1），88-95。
- 张亚群（1993），〈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评析〉，《八桂侨刊》（3），38-41。

- 张艳丰（2003），〈新加坡英语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6），101-105。
- 张永和（1994），《李光耀传[专著]》：珍藏版，福建人民出版社。
- 赵少华、李钰（2007），〈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1），68-70。
- 郑文泉（2007），《绝代英华：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 周朝华（2006），〈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的过程及经验〉，《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3（7），67-68。
- 周加李（2006），〈李光耀的文化认同与新加坡现代化的文化选择〉，《南洋问题研究》（2），64-70。
- 周进（2014），《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河北大学。
- 周进、刘金柱（2013），〈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国家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70-74。
- 周清海（1986），《新加坡华文教学的现况与展望》，香港：香港华文大学教育学院编。
- 周清海（1992），〈从华裔新加坡人的立场论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前景〉，新加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
- 周清海。（1998）. 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卓福安（2010），〈80年代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课程之因果分析〉，《应华学报》（7），45-79。
- 朱春珠（2004），〈李光耀精神文明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新加坡化〉，《求索》（12），152-154。
- 朱海荣（2013），《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认同》，华中师范大学。
- 朱意秋、郑敬高（1994），〈新加坡的现代化与传统儒家文化探析〉，《经济与管理评论》（1），54-58。

英文著作:

Alex Josey (1980), *Lee Kuan Yew: The Struggle for Singapore*, Singapore: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

Chelliah, D.D. (1947), *A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System Based on Vernaculars*,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Chiew, S. K. (1980), *Bilingu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Singapore case study*, Singapore: Language and Societ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Population Trends (2018)*, Singapore: www.singstat.gov.sg

Gwee Yee Hean (1969),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Kwang, H. F., Ibrahim, Z., Hoong, C. M., Lim, L., Low, I., Lin, R., & Chan, R (2011), *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Low Ee Ling, Adam Brown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Singapore English*, Singapore: McGraw-Hill Education.

Quah, J. S. T. (1990), *In Search of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oon Teck Wong. (1988), *Singapore's New Education System: Education Reform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